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7月30日第74期（增刊）

本期目录

《文革日记专辑2》

昨日心迹

孙丹年 一个“右派”女儿的知青日记（续）

【昨日心迹】

一个“右派”女儿的知青日记（续）

孙丹年

《昨天》编者按：本刊第一期“文革日记专辑”曾发表孙丹年的《一个“右派”女儿的知青日记》，选录了她1969至1972年间知青生活的部分日记，可参看。这是孙丹年陆续转录的1973年后的部分日记。她父母均为“右派”，父亲被打成“右派”并在大饥荒中饿死后，因为住房被西南师范学院收回，她母亲为解决全家没有安身之处的燃眉之急，也为了两个女儿的前途，改嫁给当地（重庆市北碚区）一个贫农出身的农村生产队副队长。作为文革“老三届”初中生里最小的初68级学生，孙丹年从1969年1月31日开始到继父所在的红光公社红光大队红光生产队（之前和之后它都叫金刚公社金刚大队金刚生产队）当下乡知识青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她和妹妹才于1978年凭着顽强的努力双双考上大学离开农村。在文革“老三届”学生中，她的知青生涯差三个月满10年，时间较长，所写日记较多，这部分日记涉及了农村生活中的劳动（农业与副业）、社员大会（会上的吵架与打架）、工分、年终决算、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之间和与上级干部之间的矛盾（包括中央“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政策贯彻到农村基层将生产队副业全部收归大队所有而发生的剧烈冲突）、本队与外队的矛盾、70年代中后期的饥荒、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知青的招工与推荐上大学，

还有她先后担任记工员、宣传队副队长、幼儿园保育员、生产队出纳员等工作中的遭遇，接触的一些不同类型的人物……内容丰富，有较高史料价值。

为帮助读者理解，以括号加楷体字的方式略作说明。

1973年1月6日 阴雨 星期六

下午关饷(年终决算，今年工分值为7角1分，主要是砖瓦窑创收，还有果树队广柑的收入，在周围农村算是很高的了，也是我10年知青生活中收入最高的一年，此后继父病重不能挣工分，拖累我和妹妹也少挣工分)，我们家有552元8角，先领百分之七十。(右图：孙丹年1972年底留影。)



1973年1月14日 阴 星期日

上午担粪，下午剪枝。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和叶队长的爱人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原因是她把属于生产队的柴(我们修剪下来的苹果树枝条，熬制农药时要用来烧火的)，叫她女儿背回家去，我干涉了几句。她唯利是图，只要对自己有利，从来不顾及什么影响。但她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宽宏大量，从不记仇，能原谅人。我十分看不惯她那贪小便宜的习惯，但又佩服她的勤劳、能干、肯帮助人。

之后很后悔，觉得不该和她发生冲突。

每一次轻率的举动过后，便要用多日的苦恼与懊悔来弥补。

1973年1月26日 雨 星期五

晚上在十八梯开民兵干部会(我不是民兵干部，但有些任务需要我参加)，布置春节警戒任务，也讲了一些目前对敌斗争形势，最近公安局破获了一些反革命案件，其中也有知青对招工政策不满，向中央投递反革命信件(应是知青向中央反映问题或对知青下乡政策提出批评意见的信件)的案子。

春节安排民兵照夜，从腊月29晚上开始，到初二结束。交了一项任务给我：油印几份春节慰问信到附近各单位。

1973年1月30日 晴 星期二

继父跟大队的王队长谈过了，王队长说，今年，无论如何是要把我和金学英等三个女知青办出去的。但是也得我们几个自己争气，好好坚持到最后一天。继

父跟王队长谈，丹年已经 23 岁了（实际上 21 岁），老是在农村住着，真没办法。无论是一个什么工作，只要能把户口办出农村就可以了。

我要想有个好工作，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两个名额到工矿，开后门也不够，哪里轮到我！

1973 年 2 月 15 日 晴 星期四

陈某的儿子女儿都拉关系调到渡口钢铁厂去了。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也想办法到那儿去。下午到袁二孃家去（继父的远房表姐），问了袁姑爷，准备写信向他们的儿子打听一下，是否有可能去渡口。如果可能，我和丹平都去。

1973 年 2 月 17 日 晴 星期六

和陈思学谈了一会儿，她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她本来到南充落户，后来转到重庆附近的璧山县。她弟弟是去年三月份到农村去的，挂钩到渡口市郊。今年她弟弟就被渡口钢铁厂招去当了学徒工。陈思学说她也准备由璧山迁往渡口，不过不是到厂矿，而是迁到农村。她说到那儿一年之后，便也进工厂。因为她在璧山县已有三年了，却一直没有机会调出来。今后也必定没有机会。

我决定不给袁二孃的儿子写信了。因为到渡口市去并非容易，还希望渺茫（因陈思学说要先把户口迁到渡口农村才能再想法进厂）。打消这个念头，再安下心来，等上三年五载，另想办法。太阳的光辉总有一天会照亮我的路。

1973 年 2 月 21 日 晴 星期三

中午到艾老师（我在一师附小读书时四至六年级的班主任）那儿去玩了一阵。艾老师很能使我安下心来。她说，我现在的处境也算很好的，各方面条件都好，应该安下心，打长期在农村的主意，甚至准备好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她说果树工作比城市的好多工作都舒服，应该安心在农村一辈子，等等。

1973 年 2 月 27 日 晴 星期二

昨天继父到九院动了手术，患的是胃溃疡和腹膜炎并发症。两点钟左右抬到九院，三点钟进了手术室。昨天和今天我都到处跑，办这办那，累得不得了。

1973 年 3 月 1 日 阴 星期四

继父基本脱离危险。刚才到王队长那儿去，他对继父挺关心的（他们少年时期曾一同吆马驮下河炭，即从缙云山上的小煤窑往停靠在嘉陵江边的煤船上运煤）。王队长今天下午去北碚，顺便也看望了继父。谈话中，我提到招工的问题，

王队长说，今年不会招工了。那些开后门的，不合法的，还要压缩回来一部分。接班顶替也禁止了。

1973年3月6日 阴雨 星期二

继父今天出院了。本来不该出院的，但他自己着急得很，忙着要走，于是中午手忙脚乱的把他接回来（当时农村的“合作医疗”报账非常少，住院治疗的绝大部分费用自理，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继父患病至去世期间，我家经济因此濒临绝境）。

1973年3月18日 晴 星期日

二十二中（重庆市第二十二中学，在北碚我们生产队附近）报考高中的学生，一共被录取了30多名。二十二中教职工子女共10人，被录取了9名，只有一个工人的女儿落榜。许多人都为这事感到气愤。我想要暴露社会上尔虞我诈、官官相护的风气，这不正是一个很好的写作题材么？（此时我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尝试。我和妹妹在知青时代的文化学习，最主要的来源是抄家之后残留的父母的藏书，其中成套的有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系列著作、普希金、安徒生、格林兄弟以及其他外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小说，鲁迅全集，我国1950年代出版的儿童文学读物，以及我母亲于1958、1959年订阅的《收获》杂志。所读书籍的另一来源是同学朋友间的互相借阅。经过土改等政治运动后，农村环境中根本不存在私人藏书。互相借阅的书籍，很多都是文革初期“破四旧”抄家之后、投入火堆或送造纸厂之前，被有兴趣的人抢救下来，或在武斗混乱中从一些图书馆、图书室流失出来的。）

一个中学生在造句时写道：“只有我的爸爸当了干部，我才能进高中。”多么锐利地一针见血地暴露了干部开后门的现象！我准备写一篇小说。这是我的爱好，也是被这事所激动。成功与否不能决定，但试一下是行的，可以提高思想水平，也可以提高写作能力。

1973年3月19日 阴 星期一

小说开始动笔了，困难很大，但我有信心克服。

1973年3月26日 晴 星期一

一连两天，我都为自己的前途深深地苦恼着。按照前一段时间的招工方法，显然是和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相违背的，也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是这种错误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我对报纸杂志上的理论文章渐渐关心起来了，希望从这些文章中找到答案。

1973年3月29日 雨 星期四

上午担瓦炭（从缙云山往山下挑运的煤有多种名称：“烧炭”是给自己家挑的生活用煤；“瓦炭”是给砖瓦窑挑的，按重量记工分；“下河炭”是给江边运煤船挑的，现金结算。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类别），担第二挑时下雨了，越下越大，我和艮小芳一道，淋得落汤鸡似的。又看见代丽她们，也是全身湿透。但大家很高兴。我认为这是劳动以后特有的愉快和满足。

但是我的小说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是退却呢，还是继续写下去？

学习了几篇毛主席著作，也看了一些报纸的评论文章，但是出路到底在哪里？

1973年4月2日 雨 星期一

下午去北碚看电影《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墨西哥》，去的时候淋得透湿，看完电影又淋着回来（年轻，从事重体力劳动，穿着湿衣服看电影也没有生病）。

知识青年到农村，而大批知识青年又由农村回到了城市，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难道光是“祖国需要”就能解释吗？

1973年4月4日 晴 星期三

今天开始打“氟乙烯氨”（给果树喷农药）。

我逐渐明白了自己处境的危险。如果我不能离开农村，真就像别人预言的“将会寸步难行”。我多么希望离开这种苦闷的生活！

1973年4月27日 晚12点

连续加了两夜班。“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从早到晚真是紧张得要命。劳动的场面是火热的，也是艰巨的，但又是快乐的。劳动之后的愉快，更是任何别的愉快不能相比的。

这两夜大队活动我也没去。

1973年5月2日 雨 星期三

我向左开云（当地回乡知青）借了一本书《唐诗三百首》（古代诗人的精神世界猛烈撞击着我的内心，从这时起，我知道了失意文人应该如何发牢骚）。

1973年5月9日 雨 星期三

“眼前有怨道不得”，无法把自己的悲哀写出来。

我有了一个模糊的愿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诗人。

1973 年 5 月 16 日 晴 星期三

前天上班时脚受了伤，前天下午和昨天、今天都在家里。我趁此机会学习了数学。困难并不十分大，因为以前我的数学成绩很好（我上重庆青木中学时，只考试过一次，数学考了全校第一名，是唯一的数学满分。这所学校只招收了初 68 级一届学生，文革后撤销了）。

1973 年 5 月 17 日 晴 星期四

晚上我到张大菊家去为她写信，又到李大彬那里去借书（代数、几何课本，他是继父的侄子，复员军人，原二十二中初 68 级学生，初中课程几乎学完了的）。李大彬的东西保存得很好，他的课本从一册到六册全都保存着。我高兴极了。

1973 年 5 月 18 日 晴一阴 星期五

我决定抽时间抓紧自学，以备听谣传中的技校招考。

晚上和早上抽出时间学习数学。初一的课本学起来不太吃力，但初二和初三的就伤脑筋了。我多么渴望读书啊，但是学校不收你也毫无办法。不应抱太大的希望，否则会遭到很大的失败。而行动上却应该从最好的方向努力。

1973 年 5 月 25 日 晴 星期五

从昨晚上开始，我们轮班照苹果（“照”指照看，即守夜，因苹果成熟了，怕被人偷摘）。去年照苹果留下的记忆是愉快的，但愿今年也能如此。

劳动是繁重紧张的，早上有时可以学习，但有时要担水、做饭，中午回家家务事也多，晚上下班要打猪草，并且，现在每过两天要照一个整夜（照苹果）。

照夜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们五个人挤在一起，热的不得了，蚊子又多。但是我们却因为疲劳的缘故，每个人都睡得像死猪一样。

这样的生活，能抽出多少时间来学习呢？

1973 年 5 月 26 日 晴 星期六

罗世模的姐姐从成都透露的消息，中专招生条件：23 岁以下，在农村锻炼一年以上。

我得加紧赶才行，时间刻不容缓。每天晚上我都学习数学到深夜。

下午评工分，我力争李大彬得 10 分，但大家的意见是 9 分半。最后落实也

是 9 分半。

1973 年 5 月 27 日 晴 星期日

上午在十八梯上班，罗世模也告诉我，大学招生，全国共招 16 万，大部分从农村招，工矿及军队招少数。条件是：未婚，25 岁以下。

罗世模对“官官相护”的风气深信不疑，“财无不成世界”，如果无钱无势，他认为绝对行不通。而他对这种习惯势力又深恶痛绝，因为他就是这种恶俗的受害者。罗世模是一个被埋没了的人才。

我对上学读书绝不能寄予过高的希望。如果说只收知青，那么我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不管什么人一概而论，那便毫无希望。但行动上却要从最好的方面去争取。

看过了《唐诗三百首》，十分感叹李白的气魄的宏壮，意境的开阔。而最使我触动心弦、感到亲切的是白居易的《琵琶行》，读到“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时候，不觉凄然泪下。

我和金学英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我们都不希望出人头地，但是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我和金学英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这和代丽的友谊完全相反。我和金学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973 年 6 月 3 日 雨 星期日

万一没有希望读书，我的理想又一次破灭，努力又一次落了空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又将陷入无望的黑暗中去，看不到一线光明。

1973 年 6 月 5 日 晴 星期二

今天端午节。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上前天打猪草，打了赤脚，脚上遭了粪毒（一种皮肤中毒症状），整整两晚上没合眼，又痛又痒，实在是没有办法。而白天便无精打采，有气没力。加上吃饭也少了，肚子很饿，但不想吃。

下午到北碚九院去看望继父，他开刀两天了，情况比较正常。（上图：孙丹年的继父与弟弟。）

1973年6月6日 晴 星期三

李大彬借给我的代数书，半个多月了还没学到一半。一方面是因为没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人教，自学太吃力。刚才去找了郭老师（二十二中的数学老师），他给我指出了必须学的和不必学的，我的进展便加快了许多，犹如找到了一条捷径。

1973年6月20日 阴-雨 星期三

考大学或中专，我是绝对没有希望了。听别人说，大队党支部准备推荐另外两个人去。耐心的等待吧，这一次机会错过了，下一次或许还有机会呢？

1973年6月27日 晴 星期三

今天摘苹果。

我对复习数学已经兴趣索然了。因为我对考学校已失却信心，感到不必再在注定要失败的事情上下功夫。昨天中午我到三伯伯家去，李大彬说我学习进展太慢，我就说，我根本不打算学了。他劝我坚持下去，以便在今后需要用的时候不为难。我一想他这话也对。决定还是坚持下去。

1973年7月2日 晴 星期一

上午担煤炭回来时，左开云告诉我，他那位爱写诗的同学梁某某回北碚来了。我向他要梁某某的诗，他反问我写诗。我极力否认写过诗，他不相信。

中午叶光全（生产队长）叫我写申请进大学。我明知道毫无希望，但还是写了。

下午社员大会讨论，另一女知青虽有大队和生产队的一些干部作后台，但一般舆论倾向于我，真心诚意推荐我的有梁万华、刘远明等。明知不能实现的事，却偏要做过场，真虚伪得可耻。不过也看出了群众对我的印象很好。

（这次推荐大会有北碚区招生机构和公社派人到场监督，群众举手通过。本来大队内定让另一个女知青上大学，群众不同意，场面很激烈。第一次我的选票占绝大多数，大队长以我是“黑五类子女”压制，强迫群众再选一次。此时天色已晚，许多人因家中有事，又看清了这是个“假场合”，纷纷回家去了。但是一些真心要选我的人坚持下来，再举手一次，依然是我的票占多数。结果谁也没能去。这严重伤害了干部们的面子，为继父去世后他们对我进行政治打压留下伏笔。此事我写进了《我的一九七八：命运变奏曲》一文，登载于《红岩春秋》2008年3期。）

1973年7月7日 晴 星期六

左开云又借给我一本书《一个女特务的日记》，限期三天看完。左开云对人非常诚恳。

1973年7月13日 晴 星期五

上午开社员大会，学习中发21号文件，就是福建省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与毛主席的复信。在这个文件的影响与推动下，王大队长要将金学英的户口办成居民，让她参加街道工业的工作。

我想，这文件对我的好处并不大，因为政府绝不会下通知将所有的知识青年全都调出农村。另一知青左艮珍考大学的希望眼看要成泡影，她比我还着急。

1973年7月16日 晴 星期一

晚上大约有三个小时睡不着，反反复复考虑我计划中的作文复习题《学雷锋，见行动》。看来，要想写好一篇文章，真难啊！

1973年9月2日 晴 星期日

有一个多月没记点什么了，太忙了。

今天当上了正式的记工员。这是个有趣味的、责任重大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讨厌的工作。

每天晚上除学习数学之外，还试写了两篇小说。一篇完成了，但不太满意。另一篇作了个半途而废，但花去的时间可真不少。

1973年9月19日 晴 星期三

宣传队瘫痪了两个多月，昨晚上又恢复了活动。批准了一个正队长和两个副队长（我是副队长之一）。又新增加了七八个人。李大彬死也不愿意参加。我只想参加活动而不想卖命。管他什么副队长不副队长，可以不管的我就不会去管。

今天和代梅一起到北碚文化馆去学唱歌。刚学完第二支歌，我忽然发现前面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很像是《牛虻》。我就注意看，果然就是《牛虻》。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他借了来。这一本比杨远明（生产大队的团支部副书记）给我那一本要全些，但还是没有完，最后大约被撕掉了两三百页。

不过我也满足了一点希望。……牛虻完结生命的方式，使他的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达到顶点。难道他的死不比泰山更重吗！……牛虻是一个多么真诚、坦白、光明磊落的人啊！

我拿到这本书，周围的世界便不存在了。什么轰然而起的歌声，震耳的琴声，

一切都没有引起我的感觉。我完全沉浸在书的最后几页里。

而第三支歌也始终没有学会。

1973年10月5日 阴 星期五

杨远明到图书馆（北碚区图书馆）领来10个借书证，给我一个。我原来以为自己看过的书是比较多的，到图书馆一看，才知道自己读书真是太少太少（这之前好像没有进过图书馆）。

我决定从马列著作看起。由于从小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少，对马列著作简直看不进去。我发挥了最大的忍耐力，克制自己不是一些精彩的小说诱惑动心，勉强看过了《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

从《共产党宣言》中，懂得了一些比较深的道理。我认识到，我的处境是不称心的。从我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命运就注定了我一辈子不得志。因为现代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给中国农村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毛主席一系列的措施，如知识青年到农村，从农村选拔青年上大学等等，都给农民阶级大开方便之门。贫下中农在中央好的条件（政策）之下，怎么能不尽量照顾自己的子女呢？何况现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私心杂念。这是一条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生活在这股激流中，必定是要被各种各样的人物排挤到后面去的。……不过受到别人的利用，有一点混饭吃的本领，生活也不会过得太坏。

如果今后再有比较沉重的打击，再有事与愿违的情况发生，我也不会怨天尤人，也绝不气馁，顺着命运安排的道路走下去就是了。但是尽自己的努力，多学一点本领，多学一点知识，却是十分重要的。

1973年10月31日 晴 星期三

看了《论写作》，只看完了其中马卡连柯的讲话。

马卡连柯小说的精彩是世所公认的，特别是语言的活泼生动，据他自己说，为了求得语言的精炼，他足足下了13年之久的功夫。

我也应这样。今后我应随时注重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情景和现象，并力求用最好的文字把他们记下来。

我生活在贫下中农之中。在这一大群人里面，有许多使我钦佩的人，如彭纯才、杨远明、罗世模、梁万华等等。这些人我非常熟悉，但是要将他们写出来，我的能力还不行，因此我得随时注意培养自己的写作能力。

1973年11月3日 晴 星期六

最近三个月我的生活过得很愉快，很满足。这得感谢书本，感谢生产队的基本群众。

1973年11月5日 晴 星期一

我给自己决定了一个题目：写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活。

1973年11月16日 晴 星期五

又教书了（又去当小学代课老师，地点在团结小学，以前叫张家坝小学，都属于红光学区即金刚学区。乡村小学老师以青年女教师为主，她们有怀孕生产的，需要找人代课，一般为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一连三年，每年一次。这是第三次了。

我不愿意当老师。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艾老师问我理想是什么，我说愿当农民。艾老师问：“当老师怎么样？”我那时的回答是：“宁愿当农民。”

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愿望为转移的。事情过去九年了，现在却为了能够当老师而竭尽全力。

白天要应付不熟悉的、麻烦的工作，放学后回生产队记工分，晚上还得算工分。我的理想大概永远也不能实现。这是为了什么呢？当生活和理想发生冲突时，态度就暧昧了。

1973年12月14日 星期五 晴

经过这次当老师的锻炼，我又发现了另一方面的弱点，即对待工作的态度。有兴趣的热情很高，一遇挫折就一败涂地。这说明了我没有毅力，没有坚定的信念。

这样是不行的，我逐渐认识到知识应该是多方面的，所谓博学，不就是指广阔的知识面，深湛（刻）的看问题本质的能力吗？

1974年1月3日 阴 星期四

我的表达能力很差，书面的就不行，更不用提语言（口头表达）了。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因为我的语汇是杂乱的，说话又快又啰嗦，吐字不清楚，影响到写作，则是杂乱无章，没有中心思想，把这一件事牵扯到另一件事，给人的印象是不深的。

我一定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自己要讲的是个什么意思，一定要说清楚，把一件事讲完再开始另一件。

1974年1月12日 早晨

昨天我们在公社演出，演完之后请了假，我和江才玉一起出来了。

路上，江才玉说：“我已经是快要失掉朝气的人了，再过五年，恐怕已经要死了！”

我说：“不会的，再过五年，我们仍然是这样朝气蓬勃，勤奋好学的。”

她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虽然20多岁了，实际上却并不怎么懂事，再过五年，那是一定比现在懂得多一些，感到自己知识太少了，会更加努力学习。”

又走了一段路，我说有位同学好久不见：“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总觉得她好高傲的。”江才玉说：“你也很高傲呀！”我大吃一惊，反问：“我哪点傲了？”她说：“你在有些人面前不傲，但是在另一些人面前，譬如说在我的面前，就很傲。”

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细想了一下，承认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1974年1月13日 阴 星期日

鼓起勇气，战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做一个勇敢的人吧！

有许多人，他们口口声声高喊：“一切服从党安排！势把青春献人民！”但是口头上的马列主义，掩盖着行动上的机会主义，他们总是处处寻找机会离开农村，和党的安排背道而驰。

肮脏的灵魂，永远放不出光彩，漂亮的口号，是为卑鄙的目的服务的。

另一种人，他们嘴里说的，便是心里想的和手上做的。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就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不要诡计，也不掩盖自己的思想。落后就落后吧，世界上的人都是堕落的，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难道自己就比别人高尚吗？

这种人和前一种人相比，心灵显得干净一些，因为他们不设法遮盖自己的思想。

罗代丽就属于这一种人。

1974年1月15日 阴 星期二

哲学，我无法学懂它。抽象的、枯燥的学科，和我的禀赋完全不相合。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没有办法弄懂。只有随着自己的理解力，能懂多少算多少。一本书看过之后，多少总有一些收获，可以消化的营养我决不放过，哪怕它同时含有许多我不能消化的成分。

我看书有两个目的（抓两个重点）：政治上的大方向与艺术的新颖、特出。

1974年1月17日 阴 星期四

昨晚上到大队去，是政治夜校小组长、宣传队正副队长开会。宣传队长兼政治夜校校长说，参加区调演的对口词（表扬保管员先进事迹的节目），公社已经决定，让我和她演（这是我和丹平表演的保留节目，一直很受欢迎）。

真扫兴！我早已下了决心把这个节目演好，以前我和丹平的每一次演出都博得一致好评，我想争取参加市里的演出。谁知事情竟是这样出人意外，把丹平换成了她！

我不愿意跟她一起演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现在是区、公社的大红人，真可谓红得发紫。我不愿意和这种人多交往。而且在人生观、性格、脾气、爱好等各方面，我和她毫无共同之处。她和丹平相比，我又哪能这么神色自如呢！

但，从工作出发，我还是认真和她搞好这次演出。

1974年1月18日 晴 星期五

为什么要把丹平换掉，这问题今天明白了。最近一个月来，丹平开始学习记日记。老实说她的水平比我高，思维能力强，思想清清楚楚。她记得最多的是对人的观察、了解、看法。她厌恶宣传队的领导人吴某，日记里好几处地方提到吴某都用了蔑视的语气。在最后几天，她写了妈妈，夸妈妈的好处。

没想到，丹平的日记被吴某偷看了。我猜想，丹平正是她要排挤的人。这一来，抓住了把柄，可以置丹平于死地了。

从理论上讲，丹平对这人的看法不是大问题，只不过是同志之间不团结的牢骚话，但提起妈妈的地方是立场问题，其中有一句“五七年受了打击”，则完全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了。公社干部从吴某的愤恨出发，从丹平的立场问题着手，撤换了丹平的节目，还准备开除丹平出宣传队，让她回生产队来。

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我和丹平的一生恐怕会因此受影响。不过，无论什么样的打击我都准备承担，不会垮下去的。（右图：孙丹平演出照。）

刚才去找了杨远明，看他有什么消息。但他还不知道这件事，他说他有许多想法要告诉我，叫我明晚上再去。



1974年1月19日 晴 星期六

刚才从杨远明那儿回来。杨远明说，丹平的问题比较严重，但关键是自己的认识问题。如果认识得好，领导上满意，处分不会太严重。只要我努力干工作，对我的影响也不大，甚至完全没有影响。

杨远明对路线斗争的认识比较清楚深刻，他经常参加学习，平时也刻苦钻研，肯动脑筋想。他说：“我发现你喜欢看书，钻研理论，但是不和实践相结合，这样的理论学了用处不大。”谈到关于创作、写作等问题，他说：“我那次跟龙书记谈过，丹年和何艺斌搞创作可以，但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深刻。对于路线、纲领，或是根本不敢碰，或是碰一下又缩回去。至于描写景物，安排情节倒是好的。”我说：“文艺批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艺术的……”他接上来：“你们恰好是第一个标准低了。”

1974年1月26日 晴 星期六

杨远明给了我一本《学习参考资料》，全是《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中的名词解释。我花了将近两整天时间学完了，有了很大的收获。例如，对“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论点我一直抱怀疑态度……

1974年1月27日 阴 星期日

我迫切地希望弄清的问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阶级斗争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到了农村后，最大的难关是思想上的……城市的人们从小就灌输了这样一种偏见：农村是劳改的场所，是贬置犯人的地方，下了农村就是进了地狱，走出农村回到城市就是进了天堂。

时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谈话：“某某结婚了，爱人是农村的。”“啊呀，真倒霉！”

或是：“你的儿子调回来了吗？”“谢天谢地！托了很多人的，花了不少钱，昨天刚回家。这下可好啦，你来玩吧！”如果是“我的儿子还在农村”的话，那就不免要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了。

正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们，绝大多数成天向往着城市（比如我）。农村真是住厌了。说实话，沈秀芹、朱克家等等人（党和政府树立的知识青年典型），一万个知识青年里能否找到一个呢？

我想，引起这种传统看法和对农村的畏惧心理的，不外乎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解放前农民生活的愚昧无知……（生活上）

二、由于没有实现机械化，体力劳动强度太大，生产方式落后……（工作上）

三、思想教育太少，对知青的关心教育都是形式上的、完成任务式的……（思想上）

同时在这三种原因之内，还要加上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阶级敌人是要千方百计破坏这一工作的。

因此，从1964年那一批到南江县知青（文革前被安置到四川大巴山区的南江县下乡的老知青）的遭遇一传开，都把农村看作地狱，到了农村的人是要由毒火来熬炼的。但是，最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整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阶级斗争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不把它看作是幼儿园里的简单故事……我想要知道的是，像刘少奇和林彪之类的篡党夺权的严重斗争，和每一级领导中的修正主义黑线……太不明白了。

1974年1月30日 阴雨 星期三

借来一本《西游记》（很残破），是从五十一回到七十四回的一段。

下午生产队开社员大会，闹得一塌糊涂。队委会先宣读了公社文件：水库要在1974年底修好，水库工地必须上足四百人。去的人，男的每月必须完成260分，女的不可能完成260分，就必须完成26天。然后宣布到水库上班的名单，一共6个人，叫到小屋去开会。

严光才第一个抹了脸骂道：“我就不去！看这几爷子干部把我吞了！”杨忠秀也叽叽呱呱的吵开了：“为什么偏要叫我的儿子去？陈义武他一个年轻人，抬石头又没经验，合不上脚，哪个跟他打连？明知道水库活路重，半夜吃桃子，按倒葩（川语，指软）的捏！我们几个人好欺负吗？”张道菊慢声慢气的开了腔：“我说嘛，生产队一百多个劳动力，哪个不是筋强力壮的？我女儿在家连水都没担过，叫她到水库去成天担，她受得了吗！生产队派人要合情合理嘛！”

上任不久的生产队长听见一片喧哗，眼睛瞪得有鸡蛋大，亮开他那粗大喉咙朝大家叫：“生产队的决定一定要执行！有话慢慢讲，去是一定要去的！”

刘立云站到桌子边去，朝几个干部说：“请队长你们考虑一下，我家里只有我和妈两人，我妈年老有病，我走了，家里水都没人担。再说我在生产队上班，几时偷过懒？几时没服从安排？把我挤走，啥子意思？”

副队长翻起眼睛朝他看看，还没来得及开腔，严光才又挤过去了：“喂，我说，为啥子调工作的时候，全是干部子弟去（副队长的女儿已离开农村参加了工作）？社员的子弟不能去？一遇到重活，吃亏的事情，又把社员推出去了？”严光才还没说完，陈义武跟副队长吵起来，副队长平时说话总是口水四溅，现在口水喷到陈义武脸上，陈义武气得额角上暴起青筋，胀紫了脸，骂道：“你为什么

吐我的口水？老子今天揍你！”他妈妈杨忠秀急忙蹦过去拉开儿子，副队长也按不下火气，大声说：“我今天就看你揍我！”陈义武要朝前蹦，无奈被他妈拉住，气哭了，大骂：“你个狗日的要吐我的口水！老子要揍死你！”没料到副队长的哥哥过来骂：“你个狗崽子要骂我的父母，老子今天不饶你！”跟陈义武就抓扯起来。旁边又来了副队长的儿子、他哥哥的儿子和女儿，一齐要跟陈义武打架。陈义武也不示弱，幸好他哥哥过来和他妈妈一起拉住，否则定要打个头破血流。

1974年2月1日 雨-阴 星期五

上午去北碚，到何嬢嬢那里去耍了一会儿。何嬢嬢的丈夫颜老师，本来是税务局的干部，后来到西师读大学。他爱好外文，但学校分配他学中文。1953至1957年，整整学了5年。毕业后到24中教书，依然爱好外语，教外语。1966年他嗓子长了肿瘤，放射性治疗，保住了命，但耳朵聋了，舌头也硬了，牙齿也掉了。病好后，请了长期病假，一直在家。他对外语的爱好一直没放弃，病退以后依然天天在家看书看报，看外文杂志。遇上有趣味的文章，他就把文章翻译成俄文。

他教17岁的儿子学外语，但那小伙子没兴趣，学得很勉强。

颜老师大约有四十八九岁，高高的，不胖不瘦，秃顶，牙齿脱落了一半，舌头不灵便了，说话很吃力。加上耳聋，交谈不方便。他很热情，叫我去学英语。

我考虑了一下。学外语不仅需要时间，还得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才能真正学到。我的另一些学习因此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件事对我是有益的，我可以学到另一方面的知识。

何嬢嬢爱吵爱闹，喜欢关心各种奇闻怪事，热衷于打探那些事。她总是责怪颜老师不会煮饭做菜，说他：“一天只是看书看报说些外国话，有啥子意思！”颜老师就说她：“光夸自己做饭炒菜手艺好，也不害羞！”两个人都很有意思。

1974年2月5日 雨 星期二

路遥知马力，烈火炼真金。关键时刻最能衡量一个人觉悟高低，思想好坏。

昨天，瓦厂正加紧烧窑，煤却不够了。王队长一向是安排瓦厂工作的，他叫我下午去发瓦炭（到煤窑称秤的地方去坐着，记下每一个挑煤者的名字和所挑煤的重量，最后自己担一挑煤回来）。我叫上一批人，走到么店子，谁知煤厂因为上午打架（去买煤的人因为不依次序争抢好一点的煤炭打架），煤厂的书记发火了，说是谁也不许担煤走。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我叫来的几十双眼睛盯着我，却什么办法也没有。最后无可奈何，我抽身就走了，于是三、四十个人也跟着我跑了回来，一路上好埋怨。

回来之后，我先到瓦厂看了看，熊熊大火烧得正旺，可是煤只剩下很少一点。烧窑师傅说最多不过烧到晚上八点钟，以后只好停火，三万多块砖坯全部损失，责任在谁呢？

我跑到河边，先找王队长，问他怎么办。他瞪起眼睛想了一下，似乎觉得这事有点棘手，便一甩脑袋，大咧咧地对我说：“这事情不能找我。罗世模是副业队长，你去找他，看他怎么说。”我心里想，从来都是你在安排发煤炭，罗世模根本没有过问这件事，到这个关口去找他，万一罗世模的牛脾气发了不想管，又怎么办！

我知道直接去找罗世模，他肯定要碰我一鼻子灰；但是不去找他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罗世模正在和另外三人一起抬石头，他看见我就问：“你发瓦炭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把前后经过一说，他皱眉头了。我说煤厂有的是煤炭，就是书记不开口，不许担煤走。我是个平头老百姓，去说了也不顶用，只有去一个干部，跟他讲清楚情况，大概是可以担的。

罗世模问：“王队长怎么说？”我回答：“他叫我来找你。”罗世模果然火冒三丈：“这种时候他就不管了？我又不是捡破烂的，别人丢掉的烂摊子我来收拾！去他妈的！”

我一听罗世模肯定不会管这件事，只好打算去找谭队长。但是，罗世模虽然嘴里不干不净地在骂，却另外叫了一个人代替他抬石头，他自己气狠狠地走过来了。他问了瓦厂的情况，知道今天下午非想法找两吨煤不可，就同我一道回去了。一路上，他大呼小叫，半强迫半哄劝地把刚才因为担着空箩筐回来，现在正在坡上干活的社员叫了去。许多社员因为刚才没有担成，现在都不想再去。罗世模说：“大家都去！上了班的，不去担煤炭不计工分！瓦厂烧得正急，没煤炭了，你负责！”说得大家都担上箩筐跟着他走了。

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也很热爱集体，一共去了44个人（一般是女的每人挑100斤，男的每人挑120斤），担回两吨多煤炭。今早上6点钟罗世模又来叫我们，今天一天担回十多吨，不仅解决了这一窑，连下一窑的煤也存下了。所以，关键时刻是最考验人的。

1974年2月6日 阴 星期三

杨远明说：“丹年有能力，但是政治方向不明确，干起工作来总是东摇西摆，冷一阵热一阵的。”我觉得，宣传队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组织起农村中有朝气的青少年……另一方面，为大队干部挣面子，成为争宠夺势的工具。这后一点，大队宣传队还痕迹不明，公社宣传队尤甚。

对我来说，还是记分员这一角更实际些，关系到生产队每个人的饭碗，也有

长远意义。

1974年2月8日 晴 星期五

如果操持家务不能干，将来必定被欺负（农村妇女若不善家务，会遭到婆家乃至亲友邻居的轻视，一辈子抬不起头）。

从长远的打算来看，如果将来不在农村，就不用说了。如果真的要农村一辈子，如果继父去世，家务事必然落到我的头上（事实也如此，继父去世后我成了家里对外、对内的顶梁柱）。外加自留地、喂猪……而生产队、大队的领导对我又如何呢？（领导们被我得罪得很彻底——去年推荐上大学，群众非要选我）权势者的欺压、打官腔……

我承认，从来没有认真规划过在农村的生活。如果环境永远不变，必将生活得很狼狈。

1974年2月11日 晴 星期一

昨天上午，送尹邦明去上火车（送到北碚），然后到何家嘴买包谷（返销粮，或救济粮）回到家已经下午两点多钟。吃过午饭，我正要拿出书来看，忽然颜老师来了。

颜老师真是一个热心的人。那一天分手的时候，我说要去他那里学英语，星期天他在家等了一天，我因事情多没有去，他很失望。昨天又是一个星期日，上午他又在家等，我又没去。等不得，他干脆自己上我们家来了。颜老师说话很不方便，可他说起英语来比中国话还流利。他太爱这个职业了，离开本行便觉得生活枯燥无味。我跟他学了英语26个字母，练习写了一会儿，五点多钟颜老师才走了。他告诉我，教，并不是难事，难的是坚持天天学，自己刻苦练。我告诉他，下一个星期天我一定上他家去。

颜老师刚走，李大彬来了，李大彬对英语的记忆很好，我和他一起学了一会儿。

1974年2月14日 晴 星期四

即将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昨晚和今晚到大队开会，作了动员。

文化大革命名副其实是革文化的命，现在掀起批林批孔热潮将文化革命更深入更彻底地推进下去，连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也彻头彻尾挖了出来。“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可见，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流毒甚广，其毒根甚深，它确是为历代剥削阶级统治人物效劳的，和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毫无关系，危害不浅。

1974年2月15日 晴 星期五

刚才在十八梯和罗世模、李大彬扯了一下。谈到批孔中“男尊女卑”这一话题时，罗世模发表了他的看法：“有一种认识认为女的生来就要笨一点，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读高中时有一个女同学，头脑很简单，不光成绩好，反应快，凡是遇到问题她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同时还具有实干精神。毕业后先分配在成都，现在到西安去了。有的男同学就笨得像猪一样……”（罗世模读过高中，但没上大学，没找工作，回了农村。）

对文学作品，罗世模也有他的看法。他看《艳阳天》每晚都看到12点才睡。为什么呢？他说：“这本书看了好，值得！看一百遍也值得！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想想自己是怎么做的。”他是从什么立场来看待这本书的呢？因为《艳阳天》写的是现代生活，写的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书中主人公萧长春是怎么和阶级敌人斗争的，怎么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作为一个农村的基层干部，对这本书的评价当然很高。（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艳阳天》比《创业史》差得太远了。《艳阳天》基本虚假而《创业史》基本真实。当然我不能说出来。）

而其他小说，罗世模是不看的，他丝毫没有文艺上的“天赋”（罗世模叫我教唱歌，我发给他一张油印的简谱歌单，他接过去念：“1236，532……啥子意思？”）。

1974年2月19日 晴 星期二

荣誉，它带给人的是什么呢？

紧随荣誉而来的，是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和往日旧友感情上的裂痕，是被当作别人讥讽的目标，也是降下地狱的阶梯。荣誉是世人争夺的目标，尤其在现在的形势下，它是有毒的。

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知识太贫乏了。连一篇批判稿，也绞尽脑汁才写了出来，还不能使我满意。必须加强学习，把头脑充实起来。

1974年2月20日 晴 星期三

晚上到大队宣传队去，原来的宣传队长升官到公社去了，改选队长。我依然是副队长。

（新任队长啥也不懂，啥也不会）真是莫名其妙，今后我的困难更多了。要是换一个生活环境，我根本就不会再去参与这种事。每天的杂事千头万绪，责任也加重了。

但是我刻苦学习的精神却并没有减弱。这种精神我是要保存一辈子的。

1974年2月21日 晴 星期四

早上七点半出门，晚上十一点归家。上午去北碚文化馆学了6支歌。下午回大队开批判会。批判大会结束已7点钟了。大队干部们婆婆妈妈的啰嗦，我简直不耐烦。因为今天晚上有空，我要到杨远明家里去跟他聊聊。

但是彭纯才当了缙云山风景管理所的一个什么职务，新上任总是热情的，他把龙书记、杨远明和我叫到他家里去吃晚饭。我们一起上他家里去，吃过饭已是9点钟了。

然后我才到杨远明那里去。每跟杨远明谈过一次之后，总感到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这些天，原来的宣传队长在公社先进代表会的发言使我很反感，我对荣誉的看法起了变化。

杨远明就说：“我认为搞工作积极得过火，一心想当干部的人是傻瓜。农村干部，费力不讨好，红得发紫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居心不善！”杨远明也看不来这个往上爬的宣传队长。

谈到大队干部，我说自己总看不得某位书记，不阴不阳的。杨远明说：“他处理事情时原则性很强，对人不抱成见，对年轻人有什么看法马上就提了，事后不会计较。另一位书记处世油滑，许多人都玩不过他，不过他遇事办法多。”

批林批孔进入了高潮，下午妇女开批判大会，年老一些的妇女连批判带诉苦，对我教育很深。发言最感动人的一位，她边哭边讲，大家也跟她一起掉泪（她是一个弃女，被养母拾来养大的）。我深深地体会到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他们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对孔老二和林彪的复辟倒退阴谋最痛恨。

晚上政治夜校学习，请了市一师的老师来作讲解，系统地讲了天才论的来源、影响及毒害。我们听得入神。

1974年3月7日 晴 星期四

矛盾是复杂的，我以前太幼稚了。自从以前的大队宣传队长在公社先代会发言后，我对她的看法彻底起了变化。她在发言中夸大她一个人的作用，把大队宣传队的成绩荣誉集于一身，并发出豪壮的誓言：“永远扎根农村，誓把青春献人民！”这难免太使人气愤了（实际上大队宣传队的灵魂人物是杨远明，他最具有凝聚力，花费的心血最多），恰恰也暴露了她的私心（她喊出“扎根农村”使很多人都觉得刺耳。之后她便力压群芳被推荐上了大学）。

杨远明的眼光比我锐利，他说，这人的手段是高明的，她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估计也是贫下中农推荐去的，不然哪里会那么大年纪了还在读中学）就插进大队宣传队来了，她看出红光大队宣传队的基础很好，她能够在宣传队里初试身手。

正式当上大队宣传队长以后，把宣传队的骨干也团结到一起，如她自己所说：“用诚恳、坦率的态度，耐心帮助、教育的办法”，确实把宣传队搞得像一盆火一样。这样她的基础牢固了，名誉地位有了。加上正在搞农村文化工作试点的政治形势，她便在公社、区里大大地出了一回风头。

在这种情况下，她还需要不需要以前的帮手呢？肯定不需要了。她当上公社业余文化干部，把我们大队的政治夜校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大队的政治夜校空空洞洞，华而不实，很扫兴。

我的思想跟杨远明是相通的。我才刚刚感觉到的问题，他早已看穿了，并思考了问题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以前我确实是太幼稚了。

1974年3月8日 阴雨 星期五

晚上宣传队活动，一反以往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搞得热闹又欢乐。主要是曾三（被选拔到公社宣传队）、何三回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解决最困难的问题——舞蹈。

我真感谢他们啊！曾三跟我是两年的好友，何三对文艺的热情无与伦比。前天晚上，当我和现任队长被困难阻住时，在公社发言的那位所谓“诚恳真挚的巨人”却躲在一边。而本来与他们并无关系的曾三何三却以如此真诚的热情来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鲁迅先生这样教导我们，我应该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上。

1974年3月14日 阴 星期四

经过这一次的教训，以及丹平在公社宣传队不愉快的结果（妹妹丹平被退回生产队来了，相当于被公社宣传队开除。立即被发配到别人都不愿意去的水库工地上，去完成极其苛刻繁重的劳动任务），使我的思想进到了高一步的境界。

怎样对待不值一文的名气，怎样对待荣誉，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毫不相同的动机和目的。虚伪的人，和杨远明的坦荡豪放是鲜明的对照。何三与曾三已经帮我们编好了舞蹈，就舞蹈动作的气势与姿态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大队宣传队水平的低（与他俩所在的公社宣传队相比较而言，大队的水平实在很低）当然不能尽量地把这种气势表现出来。昨晚上曾三何三没有来，那位唱高调的就趁机把她认为不合适的地方改了。

作为我来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在曾三何三的帮助下本来已大体就绪，只待反复练习，而她趁两个编舞不在场的时候跑来节外生枝地插手干预，真虚伪！

1974年3月16日 晴 星期六

妈妈对我讲，目前要紧的是要有一技之长，也就是说得有一手混饭吃的本领。政治活动积极参加就行了，不要异想天开地去胡搞一套。她是希望我当好一个普通人，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地过完这一辈子。

我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做出成绩，必须从最细小的事情开始；要想当一个伟大的人，首先是当好一个平凡的人。

1974年3月18日 雨 星期一

杨远明对那个说大话的人的不满，不是偶然的。他和她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毫无疑问，杨远明和彭纯才是一样的。他积极地搞社会工作，不是为了个人奋斗以达到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另一人的积极却正是为了替自己谋得较好的政治地位和生存环境。

我吸取了以前的经验，不再加入这些矛盾中去。

1974年3月20日 雨-晴 星期三

急于生活也忙于感受（不知是哪位诗人说的）。要记下的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就写最重要的一点吧！

知识青年在农村，要受到各种艰苦的考验。劳动上的、生活上的、兴趣爱好上的，特别是旧传统观念的围攻。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苦闷。那几乎使人窒息的烦闷在我的回忆中留下了可怕的孤独的烙印。

农民，这个勤劳、宽厚、愚昧、自私的阶级，留下了旧社会的许多影响，旧习惯势力的根子最深。但是在历史上它又是富于革命性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论哪一个国家，工人阶级离开了农民阶级，革命都会陷于失败。

但是，我为什么跟一些似乎是“最善良、最老实”的人合不来呢？是他们真正“善良”得过分了，还是我太冒失了呢？总之，我跟他们在兴趣、感情上格格不入，他们关心的事我毫不注意，反之，我最迫切的愿望，他们也一点不能理解。真有点像林彪宣扬的什么“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了。

1974年4月2日 晴 星期二

宣传队员们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缪二和李三是城隍庙的鼓槌，他俩总是在一起。缪二傲慢机警，李三憨厚耿直，他俩心地善良，对活动很热心，是宣传队的骨干，听说李三还被培养为生产队副队长。冯三是一个怪机灵的家伙，头脑反应很快。他不爱出风头，说话颇注意后果，做事很认真。他的父亲是生产队里

最受尊敬者，二哥是石匠。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很受注意却并没有权势的家庭里。冯三也是满口诙谐，恰到好处。他是一个不受注意但又离不了的成员。

水口生产队（即红星队）的几个女青年，朴实单纯，对宣传队很热心，很逗人喜欢。代梅，曾经使我感到那么棘手，经过长期接近，成为臂膀，比新上任的宣传队长还强。现在她和我已成知友，心照不宣。

那位曾经红极一时的人物，大家都不屑于理睬，她只能被大家冷淡。

1974年4月8日 雨 星期一

昨天，宣传队利用政治学习的时间，成功地（在两个地方）进行了两次演出，晚上又到团结大队演出。

宣传队的绝大部分队员保持着质朴单纯的本色。我们内部没有风头主义、宗派主义，演出成功是大家的荣誉，局部失败也各负其责，各自作自我批评。演出时基本步调一致，齐心合力，长期保持了朝气蓬勃的气象。从宣传内容来说，紧跟形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为政治服务，因此哗众取宠和风头主义都不存在。

昨天下午在本队演出，打连箫时我跳错了一个动作，刚发现自己做错了，便碰上了缪二那友好的、又含着责备的目光。今天我一回想起缪二当时那会心而谅解的样子，就感到一股温暖的笑意涌上心头。

刘远贵初露锋芒，他的方言朗诵得到包括公社副主任在内的的好评。可是最初排练时他那种拘束、不自然的样子，使大家多么担心啊！经过虚心学习、刻苦练习，他终于成功了，大家都为他高兴。远贵说：“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自己生产队演出时心里要自然一些，不那么紧张。”事实上，昨天他在本队的演出很大方，甚至有点得意非凡，连他的爸爸都听入了神（我们在各生产队巡回演出时，最入神的观众是宣传队员们的父母、祖父母，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能够如此出色，心理满足，非常得意）。

1974年4月17日 晴 星期三

最近几天，社员们议论纷纷，都谈论着11号那天我被副队长（不到40岁，是大队书记的隔房侄子）训了一顿的“新闻”。（这件事情实质上是性格粗暴作风不正的副队长欺负我。他不敢正面批评违背了他的意志即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社员，只好欺压我这个记分员，杀鸡儆猴。但是关系到的是大家的利益，引起了普遍对我的同情。后来在水田里拔草时，他用开玩笑的方式公开向我道了歉。由于他语言粗俗态度不正经，感觉上不像道歉。我还没想通，继父说：“你还要怎么样啊，你想要他在大会上正式向你道歉啊？！”继父的意思是，你一个黑五类子女，人家根红苗正的生产队长，都向你道歉了，还不够吗？）

近来我常被这一矛盾苦恼。干部要执行政策，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带领大家苦干实干，可是干部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有自发思想，有自私心理（自发地想搞点副业、卖点农副产品，当时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干部要制止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社员要顽固地开后门，走不正之道。这个矛盾的尖端表现在工分上，记工员这个角色就正处在矛盾的焦点上。

这一角色非常需要斗争精神。但是我的秉性中恰恰缺乏这种精神（我的“黑五类子女”身份使我不能去参与“阶级斗争”）。



（上图：孙丹年〔左〕与妹妹丹平。）

所以，不可避免，也毫不奇怪，为了原则上的问题，我被副队长训了一顿，哭了一场。

社员中的舆论是同情我的，连会计也打抱不平（会计素来好性子）。但我知道自己的弱点，不能全都归罪于副队长。我想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放手不干了；二是培养锻炼自己的原则性斗争性。

1974年4月18日 阴雨 星期四

杨远明最能解开我心里的疙瘩。好容易盼到民兵训练结束，我也不管风大雨急，今天晚上就到他那里去了。杨远明几句话便澄清了一团迷雾。

他说，领导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站稳立场，坚持原则，有什么大不了呢？

我到他那里每次都一坐半夜，话好像总也说不完。但今晚上我看他实在太累了（他是民兵干部），军事训练4天的疲劳，头脑的重负，需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便决然起身告辞。就这样，也感到精神上轻松不少。

1974年5月22日 晴 星期三

目前形势是“天下大乱”。以前的社会秩序，道德标准，一般常规，都随了东海之波，一去不返了。

最听党的话的人，是一些最吃亏的人；反其道而行之，却众目相随，众心相羨。如果不是这天下大乱的形势，熏风迷雾能行时吗？我相信等山雨过后，云散天晴，一切就又按正常规律进行，“乱”也就不存在了。

读过《写作学习》，我感到自己的写作技巧真是差得没有底。以前有个坏习惯，提笔就写，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结果是啰嗦杂乱不知所云。罗列许多现象，

抒发许多感想，却没有明确的目的，漫无中心。以致我的所写，都不得要领，不能像鲁迅先生所说：“文章虽然短，但却绞了许多脑汁，锻炼成精锐的一击。”关键就在这“一击”上。我是连发许多击，又不稳又不准，更谈不上精锐了。今后一定要通过锻炼把这种习惯改过来

1974年5月23日 晴 星期四

王亚文（刚认识的一位回城女知青，她虽然回城了但找不到工作，不过能领到城市户口供应的粮食及副食品票等，比知青强多了）的妈妈（二十二中学的教师）是一位贤良的母亲，也是一位正直的老师。她用正面教育来影响她的孩子，也并不束缚孩子们的思想和性格。她和我的母亲有共同之处。

今天我到她的家中去耍了一会儿。谈话马上就涉及到知识青年问题，这是许多家庭都共同关心的问题。王亚文虽然回到父母身边，但是没有工作（王亚文有一个姐姐，因身体不好没下乡去，还有一个妹妹年纪还小）。

没有工作就得闷死！思想要有所依托，有所发挥，才能要有所使用，不愿白白浪费光阴的青年人，决不安于坐在家里吃闲饭。

我向张老师诉说了我现在的情况，她开导了我。我发现王亚文许多思想意识的来源，在思想极端苦闷无出路的情况下，她听到的不是忧愁的叹息，看到的不是焦虑的眼光，不是毫无意义的同情和怜悯，而是慈祥善良正直的母亲的教导。这是何等深情的关怀啊！

回想起在自己家中，许多时候妈妈不正是这样教导我的吗？难怪别人说我和王亚文有许多共通的东西。

1974年5月24日 晴 星期五

今天，和杨远明、刘之宪、官觉芳等9人一起，到北泉玩了一整天，照了许多相。

杨远明是一个作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喜爱玩乐的人。他避开那个人（在公社作报告自我吹嘘、让大家都看不起的人），将我们组织到北泉，以“团支部搞活动”为名，用以大队团支部名义买来的胶卷（借来的相机），照了20多张相。主要是现在胶卷不好买，就以大队团支部的名义去买；冲洗胶卷的费用由本人自己出。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活动。今天确实玩得舒服。我照了两张单人照，和其他人合照了四张，一共六张。别人也有五张的，也有六张的，总之大家都比较心满意足。

回来时有人心疼钱花多了，我就不心疼。家住穷乡僻壤，平时孤陋寡闻，如

果不参加活动，不偶尔玩乐一两次，光是为了理想，为了目标，奋斗，努力，那不成了苦行僧了吗！我已经放弃了很多玩乐的机会，丢掉了许多文艺上的爱好，闷头苦干，事实上已经有点像苦行僧了。所以，这样的机会我绝不放过。

本来还想买一个胶卷，但是妈妈不同意在这些事情上花钱。

1974年5月28日 晴 星期二

看了鲁迅的《彷徨》。（写了一大段读后感）

1974年6月9日 雨 星期日

记住：一个人，当他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时候，他才能视死如归；当他生活的中心是有意义的事业的时候，他就绝不会被各种打击压倒，也绝不会为艰难困苦阻挠。

只有心中有远大目标的人，才是坚强的人。

（这个日记本写完了）

1975年2月25日

我越来越肯定自己是对的。

路是对的，不应该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开后门，塞包袱，拍干部马屁，甚至阴谋陷害，总而言之，将调出农村，哪怕是当一个打扫夫，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是一个渺小又渺小、短浅又短浅的目标……。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只要大方向对了头，都应该力争上游。不经过斗争，是不能到达预定目标的。在奋斗过程中，不免要得罪一些人，伤害一些人。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自己正确，只要有错就改，得罪了人又有什么关系（当记分员，经常陷入利益纠葛的矛盾中，肯定要得罪人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要永远记住这句名言。

1975年4月10日 雨 星期四

（4月上旬继父因患胃癌去世。4月10日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大队书记宣布撤销我的记分员职务。因为去年推荐上大学发生的风波，继父不在了，他们就可以放手对我进行政治报复。）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困难我不怕，死，穷困，病痛，都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迷失方向。现在，我已有了坚定明确的政治目标：牺牲个人利益，为党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也许在党的眼睛里我并不是个忠诚可靠的人。这是由我的生活条件造成的。不过，“路遥知马力，烈火炼真金”，我不畏惧任何考验，也决不像某些人那样，把自己当作商品来向无产阶级卖高价。我鄙视这种人。

宣传队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不掩饰：我爱他们，这质朴热情的一群。两年来，特别是去年6月我担任领导（宣传队副队长，实际上承担队长的责任）以来，友谊正与日俱增地发展着。……万一分离了，将是多么难过啊！（我预感到将被撤销宣传队长职务。）

新的任务即将下达：篮球队（书记宣布，让我领头组建一支篮球队，实属捉弄人）。

1975年4月15日 雨 星期二

昨天晚上我们上砖（将烧制好的砖装车运走），还跟车到北碚玻璃厂去。车灯刺破黑暗，照亮前面50公尺，只见哨兵似的一排排树木向后倒退。过大桥的时候，只见加夜班的工人正在干活，桥上灯火通明。对岸一片黑暗中，显出了万家灯火。江中渔火点点，一片节日景象。都是为了外宾要到北碚来参观。

今天周身酸痛，因为是第一次（搬砖）上车，力用得比较猛。

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境界不高，老是在一些小事情上面绕圈子。今后做事要三思而行，要抑制自己的不良倾向，向自己的私心杂念作斗争。我关心别人，应该从革命团结出发，从工作出发，不应该循私情。

1975年4月21日 晴 星期一

生产队的青年们，特别是比较活跃的小伙子们，很希望成立一个篮球队。队长（梁万华）也有这意思，可是，我仍然有顾虑。

首先，我的精力是否抽得过来？虽然不当记工员了，负担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是宣传队的工作仍然是够复杂的。而且这些工作都是业余时间，不仅家务事没时间做，连个人看书学习都要被挤掉了。

再一个，队长在口头上、理论上是非常支持的，一接触到实际问题，比如工分啦，时间等等，他肯定就保守了。这样造成的困难是很大的。

如此种种我拿不定主意。但是我相信，如果认真踏实地去搞，肯定能搞好，而且能坚持下去，长期不懈。

星期六晚上我专门去找杨远明，可是他很忙，不及细谈。他只是说：“队长是不可能全力支持你的，如果你有精力有干劲，搞起来也无妨。”

我又征求另一人的意见，他持否定态度：“你找不着事干！”因为他是参加过篮球队的，只活动了两三次便散伙了。

1975年4月25日 晴 星期五

我的思想境界太低，在办政治夜校这个问题上，我又走了一段弯路。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不管上级对我的看法如何，我都要朝既定方向——为人民贡献力量——努力。

1975年5月11日

今天收完麦子。刚加了夜班回来，现在是半夜一点半。

我在最近十来天懂得了一个很普通但又很难懂的道理：私人感情是靠不住的，而革命的原则是永存的。

以前干工作的动力都是由私人感情而来，一旦私人感情破裂了，或是起了变化，工作便受影响。三年来我一直没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懂得了。

懂了，就照此做去，一个人总是要犯一些大大小小的错误，何况人生的道路又是那么漫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放眼将来吧！

1975年9月5日 夜12点 久旱逢雨

金子，只要它是一块纯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发亮；在炉火里，在泥沙里，都会发亮，没有什么能遮住它本身具有的金黄色的光。我也要做一块纯金。尽管现在我身上的杂质还多，但是“真金不怕火炼”，在斗争的烈火里炼一炼，杂质会去掉，本质更会发出光来。

许多天未提笔了，今天因为受到一个不小的刺激（突然宣布撤销我的宣传队副队长一职）：为什么会突然撤去我的宣传队长的职务呢？连这次成立的由八个队员组成的队委会里也没有我。

没有说明原因，而通常这样的情况下都不会说明原因的。思想工作么，也许明后天会有人来作的，也许不会。但，都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是领导上考验我也罢，对我有什么看法也罢，或是强加于我的一些缺点错误也罢，我都能经受的。

1975年9月13日 阴雨 星期六

今天到合川参观阶级教育展览。王治金（原合川县一派群众组织头头，因在“批林批孔”中组织群众大闹县委和公安机关，被省委批准逮捕，后被判刑）是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1975年9月16日

看了电影《激战无名川》。

虽然我在生活上、工作上受到各种限制和压抑，但我还是生活得健康愉快而有意义。原因有三：一、学习是努力的，尤其是对理论的学习没有中断过。二、有领导的帮助和群众的支持。三、深深感到自己前进在党和毛主席指引的大道上，再苦再难也等闲。

个别领导对我施加压力么？毫无关系，“疾风知劲草”，对我毫无损失，反而暴露出他的弱点。

1975年9月20日 中秋

许久没到二十二中去，今天得闲，去了，受到了很好的启发。成莉娟（我在一师附小的同班同学，她的母亲是二十二中的校医）的姐夫，滔滔不断地评论文学，评论鲁迅的小说，发表他对《红楼梦》、《水浒传》、《三国》等的看法。他说，鲁迅正是对他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有着深刻的、全面的了解，他的文章才尖锐有力。任何一个作家，都必须正确、深刻地了解社会，才写得出好作品。

我认为他是正确的。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还体会不深，还看不见新生事物的迅速成长和它的伟大意义，所以在创作上彷徨不前。必须用严肃的、顽强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努力做去，认真学习，“对各样的事多看看，多想想，不要看到一点就写。”

1975年9月22日

“任何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好的思想家。”

这次又失败了（我把创作的小说拿给成莉娟、王亚文她们看，请提意见）。原因何在？根据她们的意见，我挖到了自己的思想根子：不敢把主题升高到阶级斗争上去。不敢，实在是不敢。没有那个思想水平，没有那个气魄，更不用说技巧了。

她们的意见是对的。我的思想境界太低。好好努力吧，从“毛选四卷”起，一直学到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完了，懂得的革命道理多一点了，再动笔。

1975年9月26日 雨

这次的失败，根源是思想水平太低，处理矛盾没有一个正确的原则。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在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现在起，要反其道而行之，首先使自己的思想升高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然后把好原则关，正确处理矛盾，正确处理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这几天学了《毛选》一、二卷，特别是学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路是对的，是同工农相结合的。

从某一点来说，我很感谢书记对我的撤职。因为使我看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我不是一个当干部的材料。我看见了别人的工作方法好，应该向他们学习。同时也使我受到一次很好的考验。

有些东西是永远学不完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75年10月12日 雨 星期日

今天的社员大会吵架吵得真凶。

蒋队长一家的态度是错误的。他偷队里的苕藤不对，更不该骂人，从这一点来说他完全应该受批评作检查。从另一方面来说，干部们的工作也差水平。对于现任的生产队长，应该照顾到他的威信，至少也得在会前作好充分的思想工作。他本人思想没通，怎么愿意作检查呢？又怎能教育广大社员呢？其结果只能闹成现在这样子：众说纷纭，不欢而散，没有起到团结教育的作用。

这也和平时干部们的工作作风有关。因为今天这一闹，使大家很明白地看出了对立情绪。虽然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但这矛盾在错误的处理方法下更加激化。生产队的工作千头万绪，矛盾错综复杂，但是只要认真掌握方针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能够搞好的。

无论怎样说，生产队的正气正在逐步树立起来，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的是越来越多了。只有通过这些斗争，才能克服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使集体利益巩固起来。

1975年12月10日 雪雨 星期三

最近对看书学习抓得比较紧……两年来在劳动上松劲了，主要精力没放在劳动上，这是很不对的。要像大寨人那样，苦干实干拼命干，才能改变我们队缺粮的现象，才能扭转干部、社员当中所存在的懒散作风。

1975年12月21日 晴

现在对果树抓得很紧，特别是苹果，提到了首位。我决心在劳动中好好干，不但要认真地、努力地学习修剪技术，上午担灰时还做到了上班早、做事多。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看书学习和写作创作也抓得更紧，提得更高了。这个月我已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的初稿，给宣传队写了一个故事，还准备搞一个锣鼓快板。

1975年12月22日 晴

有人告诉我，记日记是一个好方法，持之以恒必有益。

我决定坚持记下去，但不要像从前那样记流水账，要动脑筋。

今天晚上政治夜校，是梁万华上课（梁万华由果树组长升任队长），讲的果树的施肥管理。这是一项比较迫切的工作，马上就要动员全队社员去做。但是今天晚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大慎重，甚至漠不关心。梁万华讲课的方法是比较吸引人注意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政治空气不浓，一些人根本不关心生产，干群之间对立情绪大，总之，生产队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紧，做得不深。

1975年12月23日 晴 冬至

晚上到大队，民兵连整组工作总结大会。朋主任讲话。他的话尖锐泼辣，生动有力。他说，现在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在中央“农业学大寨”会议强劲东风鼓舞下，整个农村形势欣欣向荣，大干苦干的高潮正在兴起。国际形势是风起云涌，由于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由于蒋介石的完蛋，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危机的加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阵营正在大分化大改组，动乱不休。特别是台湾，已日不剩日……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越来越明显，日子越来越逼近……每个民兵战士要做到一颗红心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

1975年12月24日 晴

下午记分员来记工分时，我领到13号担煤的钱，一共3元多。下班以后，有几个搞转手卖布票的人来了，一角五一尺。当时大家都想买（年尾了，需要添置衣服被子），三个人围着我借钱。我本想不借，心想借给一个，另两个要生气，不借他们也要生气，就还是借给他们了。谁知梁万华走来，说：“借钱吗？不借！明明是投机倒把，根本就不要去买！”

我就没有想到要制止这种做法，而梁万华，一个党员，不仅想到了，而且提出来了，这就是思想的差距。

前几天李大彬说我“盛气凌人”，我为之震动不小。我从来没有注意尊重别人，总有些随便，也有些“你不如我”的清高思想，这样是不行的。同志之间关系是平等的，尊重也是相互的，不尊重别人的人，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1975年12月27日 晴

看了《试论浩然同志的创作道路》，我觉得浩然同志成为我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不是偶然的。他的创作道路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业余写作爱好者的应行之路。

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应该以歌颂光明为主，歌颂我们蒸蒸日上、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为主。

龙爷爷突然去世了，因为胃穿孔（龙爷爷是金刚碑小学聘用的炊事员）。龙爷爷是一位谦逊朴实的老人，他教养的两个儿子都是党员干部，他自己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有一次蒙老师病了，在下霜的天气里，龙爷爷煮好面条端到蒙老师床前，等他吃完了，收好碗筷洗干净，再烧来一盆热水，让蒙老师洗脸、烫脚，灌热水袋。他默默地看着，只偶尔插一句：“还要吗？够不够？”

这样好的一位老人，突然去世，引起许多人的悲痛。

今天果树组里闹了一次小小的纠纷。这是我久已注意并为此发愁的。我和代丽等，对几个小伙子不够尊重（果树组里几个女社员性格较强势，嘴比较厉害，而几个男子都比较木讷），开玩笑时开得过火，引起互相之间的挖苦和侮辱，很不好，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工作。检查起来，主要在于我们自己，不严肃，不尊重自己，开玩笑没有分寸。而他们呢，低级趣味，心胸窄小，所以陷入了庸俗乏味的嘲笑与乱取绰号之中。

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我们应该要有自尊和自重，他们要拿出男子汉的志气与胸怀。以工作为重，也不让空气太沉闷。既活泼又严肃，既团结又诙谐。

1975年12月30日

读浩然《西沙儿女——奇志篇》。

从9月份开始，我读完了《毛选》一至四卷，《政治经济学》上下两册。

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想搞创作，爱好业余写作，是对的。但是，反映什么，却是一个根本性的、关键性的问题。生活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农村，作品不去表现我们光明灿烂的前途，不去表现当家作主的贫下中农在斗争中取得的胜利，难道专门去描写落后状况，专门去写阴暗面吗？那么，你这个作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照毛主席的指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立场站到那儿去了呢？立足点在工农兵这方面吗？

以往犯过这方面的错误，曾写过一些题材不甚健康，主题不鲜明的东西。今后要认真地、彻底地改过来！

但是我的生活环境又不可能、也不允许我唱高调。要想写出深刻的作品来，实在不容易！

努力学习，努力提高！

明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后天将有元旦社论发表。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新的一年里，迈开新的一步吧！

1976年1月2日

《元旦社论》发表了，还同时发表了10年前毛主席的两首词……。

从31号晚上起，我反复听了、看了，受到无比巨大的鼓舞。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试看天地翻覆。”

1976年1月16日 晴

元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于9时57分去世了。

这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消息，使人们不胜悲痛。

外国人评价他“行高于众，功高天下”，“行高于众而无妒，功高天下而不自私。”

这几天传说我们队里最后一个知识青年（除我和妹妹外的最后一个下乡知青，下乡比我们晚得多）已调工作了，人们似乎以为我会不满、嫉妒吗？完全不会的，即使我的恶习还残存一点，也正在努力改正之中。我所追求的目标是无比高尚的，崇高的，一个渺小的城乡差别能与此相比吗？

1976年1月18日

今天是星期日，放假。我上街看了电影《第二个春天》。

里边几个主要人物的关系应该弄清楚……（一大段抄录及分析和感想）

1976年1月19日

（抄录了1月16日《重庆日报》转载《邓小平副总理在周总理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一大篇）

1976年1月20日

我们队里调走的那个人，竟然将他所居住的房子卖了420元钱。……逼迫买主一天之内交齐所有现金，逼着人家东求西借。因为这房子人家已住了近20年，入住时并没有讲明今后要卖。买主照顾、守护卖主房屋达7年之久，现在被迫马上交钱，不竟大骂此人“没良心，不认亲人！”

奇怪，竟有一些党员积极支持这一行动。

卖掉用集体的财产换来的房子，又用国家的钱财修理的房子的人，也是纯粹的共产党员。

1976年1月22日

没有人告诉过我，作为我的上级也从没明确地给我指出过，我的缺点错误到底是什么，到底表现在哪些地方？而我所遭遇的是一连串的排斥和最后的撤职，所听到的是各式各样的背后恐吓。大帽子一连串地朝我压来。

不仅堕入五里雾中，还似乎被什么潮流推向危险的深渊。我处于艰苦的考验之中。

但我始终相信自己，相信我再怎么错，缺点再怎么严重，离党的路线、毛主席的教导也不会太远。要想把我划成敌人，是永远办不到的。

自己要严于解剖自己，也应该正确对待自己。

1976年2月4日 夜11点

刚才从二十二中回来。我把最近完成的那篇《采果之后》给她们看了，她们提出了宝贵的三点：一、两个主要人物的思想都开掘不深，也没有把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限制法权来认识。二、群众的力量显示不够，特别是开头的队委会，把多数队委写得麻木不仁，没有革命气息。三、矛盾分散了。应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作为次主角的思想来源的主要因素。

当然她们主要还是称赞的，因为这半年来的心血确实没有白费。她们还建议我修改一番之后投稿。而投稿，我暂时还没有这个心思，等将来再看吧。现在只作为练练笔。

1976年2月5日

看了电影《春苗》。深刻地反映了卫生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抒发感慨一大段）

1976年2月17日

鲁迅的《药》，是为了纪念革命志士秋瑾而写……（抄录并分析了一大段）

1976年2月18日

这几天为幼儿园的筹建忙碌。（当时北碚区传达上级文件精神，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照顾农村妇女多参加劳动，解除她们带孩子的后顾之忧，决定每个生产队都要办一个幼儿园。我们大队的红光、红岩、红星、红卫四个生产队各成立了一个幼儿园。但是因为极端贫困，幼儿园没有任何设施，也没有食物。我主持的红光幼儿园地点在生产队开大会的大屋里，这里也是收获粮食时的临时仓库，经常把我们挤在角落里。）

贫下中农信任我，我受着阶级的委托（“阶级的委托”是来自上级的官话），

必须把这工作搞好。虽然我并不热爱这项工作，但是可以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建立起这种爱……

1976年3月3日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进行……（抄录一大段）

1976年3月17日

鲁迅《祝福》。（抄录并分析一大段）

1976年3月21日

《四号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分为十二个部分，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讲到邓小平的问题。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是世界观问题，要批判、帮助、教育他，不能一棍子打死。

1976年3月31日

电影《年轻的一代》。影片好极了，以广阔的上山下乡为背景，写了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年青一代……

28日我在北碚看了这部电影，今晚上又不辞辛苦跑到山花石去看。同时我发现许多人也都是看第二次或第三次，说明这部影片确实是很好的。

可惜《难忘的战斗》失掉机会了，没看成。扮演林育生的演员在那里扮演田队长。

1976年4月3日

越来越发觉目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尖锐、伟大、甚至可以说残酷……

毛主席呀毛主席，亿万人民都盼望你老人家万寿无疆啊……

幼儿园，我感到很烦。贫下中农信任我，交给我这么个工作，我是作为任务承担下来的。要是依兴趣，我永远也不会去热爱它的。但是，不热爱的工作也应该努力去做，因为这是阶级的委托。

1976年4月5日

散文是抒发感想……小说着力于刻画人物……

原来做文章有这么多讲究，以前我什么也不明白。

1976年4月17日

读完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抄录并写了一篇感想）

再看了电影《决裂》……（写了一段感想）

鲁迅的《故乡》……（写了一段读后感）

1976年5月2日

我很茫然。为什么总有些人，甚至是政治地位很高、比较博学的人，也赞成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呢？我和他们辩，他们说：并不等于邓小平被打倒了，他的所有言论都是错的。

1976年5月6日

昨天是马克思158岁生日。本想写点什么，但电灯突然熄了（停电了）。

5月1日《人民日报》纪平的文章说：“我们批判唯生产力论，目的是发动群众……”终归还是发展生产力？真不明白。

1976年5月8日

再读了《国家与革命》。这次体会最深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整个《国家与革命》都是专谈这个问题的（一大段抄录与读后感）。

1976年5月14日

“摇撼旧世界基础的杠杆”，就是生产力的提高？应该说是阶级斗争？……

1976年5月19日

经过一番思索，我第一次怀疑我所选择的道路能否走得通。

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客观条件来孤立地看待。在没有条件的时候，硬干会有效果吗？

1976年5月30日

他们都怀疑我能否在文学上有贡献。我自己也开始怀疑了。不过，在没有完全绝望之前，还得继续努力。

1976年6月2日

读了《法家著作选读》。许多问题搞不明白。今天赵老师（西师历史系的赵

彦青老师）给我讲了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历史人物。

1976年6月6日

一连读了好几个短篇小说集。懂得了怎样才能写出一篇好的故事或小说。

1976年6月8日

刚才从大队回来。曾文举（红岩队的保育员）建议我们大家在一起给幼儿园搞个团体操。我觉得陡地来了精神。这一段时间幼儿园的工作拖拖拉拉，得过且过。莫名堂。这样下去使人丧失信心，意志消沉。如果能振作起来，让精力得到发挥，那多好啊。再不能这样敷衍下去了。

1976年6月14日

自己的水平太差了，眼界也太窄了。主题到底怎样才算鲜明呢？

1976年6月15日

《幸福》（苏联小说）中的伏洛巴耶夫断然离开了他所热爱的高烈娃。这件事他做得不对……（一大段感想）

1976年6月24日

邓小平攻击样板戏是“一花独放”，这是很反动的。因为样板戏放无产阶级之花，结共产主义之果，必然要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统治。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其中也就包括了上层建筑和文艺舞台。邓小平说这话，目的就是要让才子佳人重新上台来……

1976年6月26日

在疗养院看了《沸腾的群山》，这次的印象没有第一次看的时候那么强烈。

1976年6月27日

刚才在罗世模家里，有兴弟、李大彬、罗世模的舅舅。我们辩论得十分激烈。

兴弟始终认为物质条件是第一性的，如果没有吃、穿、住等物质利益，任何人也是不能奋斗的。

李大彬则是一个消极派，什么都没意思，什么都不值得。他家里那么穷，连盐巴钱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共产主义，没那份精神。

罗世模则坚持事物有不可知的一面。他是抓具体工作的，上级怎么指示就怎么去作，不懂、不知道的就不要乱发议论。

我认为他们说的都有道理，都只是片面性的正确，从长远看，从全面看，精神可以变物质，事物没有不可知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理，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球获得胜利。

1976年6月28日

下午梁万华通知我晚上到王书记家开会。

杨远明也来了，他是一个活跃分子，满口诙谐，最近他去了一趟广西，带回来满肚子新闻。结果会没有开成，有好几个党员缺席，就听他吹牛，好听极了。

每次跟杨远明接近之后，我都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这次也如此。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搞歪门邪道。又出过几趟远门，见多识广。尤其他宽宏大量，不计私仇，当了几年党支部副书记，越发锻炼得精明强干了。

1976年6月29日

要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就必须干好本职工作（我正在积极争取入党，看了几部马列著作，深受影响，这是真心话）。在新社会，只有没出息的人，没有没出息的工作。

我决心把自己的工作干好，不是想轰轰烈烈出人头地，而是为了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1976年7月1日

我重又卷进了生产队的斗争漩涡。这次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动脑子。

队长（梁万华）是个好样的，他处处带头，以身作则，实干精神很强。这一点在现在的干部中很少见。而且他很关心我，不仅关心我的工作、思想，特别对我要求严格。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既然决心早已下了（要求入党），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参加队里的政治斗争，这给我创造了条件，也说明组织上对我信任，就更应该努力。但是万万不可像以前那样骄气十足，粗心大意，就如李大彬有一次说我“盛气凌人”一样。

“聪明的人能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愚蠢的人连自己的失败中也不能吸取教训。”

我绝不作愚蠢的人。

今天在缙云寺第一次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参加了纳新支部大会。

一个人要做到思想上完全入党是很难的。要刻苦改造世界观，要下决心牺牲一切甚至生命，要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决心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要不断地、毫不容情地解剖自己，锤炼自己。我身上的杂质还很多，要经过千锤百炼。我有这个决心。

1976年7月3日

在外边连续跑了4天，感到疲倦。

6月30号在西师幼儿园过了一天。那一天业务上的收获很大（我父亲生前在西师教育系教授的两女学生，一位姓陈，另一位姓彭，给我示范如何教小朋友们自己做玩具，她们说：“当年你爸爸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7月1日在缙云寺参加党组织活动，看到和体会到了党组织内部的斗争是多么激烈（其实觉得挺无聊的，对新党员的要求不是崇高的理想，而是“个性不能太强，要服从上级，要敢于对群众坚持原则”之类，很琐碎很倒胃口）。昨天和今天在公社参加保育员培训班。

昨天晚上到西师去看电影，“醉翁之意不在酒”。放映的《庐山植物园》、《战金山》、《杂技英豪》虽精彩，但最吸引我的却不是这些。我第一次接触了新型的大学生（工农兵学员），他们生活的环境、思想、言谈都使我觉得新奇，在我内心引起了不可名状的感情。我是多么羡慕这些人啊！他们年纪跟我相仿，登上了上层建筑舞台，能够安安静静地学知识。我的命运是乖蹇的。我渴望着思想的解放，我渴望着多跟他们接近。这些工农兵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是健康的，朝气蓬勃的。

罗朝贵（我的小学同学）在那里读外语系。哪天有空，我去找她。

回来在大队看了廖红的一张大字报。廖红的问题提得尖锐，一针见血。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今天，党支部仍然搞“任人唯亲”，确实使人气愤，她敢于这样勇猛地提出来是使人佩服的。廖红的造反劲强，但是太幼稚，水平也不高。大字报措辞不准确，问题也揭得不深。不过这也没什么，不足之处由群众补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的视野开阔得多了，不过还得努力，要让思想更深更远。

说来也奇怪，每当我望着缙云山那峻峭的山峰，就不由自主地想到空军疗养院。继父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空军疗养院的救助为他减轻了很多痛苦），弟弟在那里取出了两块骨头（弟弟两只膝盖畸形，在空军疗养院动手术，两腿各取出一小块骨头）。我服侍弟弟那几天，解放军医生、护士的严格的纪律、热诚的态度，坦率的胸怀，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常常幻想着如果自己能在哪里哪怕是当一个扫厕所的，也无比高尚。因为解放军的铁一般的意志，不允许任何私

弊，在那里可以离开庸人们，安心工作。

昨晚上在西师，坐在大学生们中间，我心里又腾起了这么一股羡慕和渴望的感觉。不过这感觉没有在空疗时那么强烈。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兴致勃勃地谈着、评论着银幕，我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听着。我不是敬佩哪一个具体的人，不是喜欢哪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我是嫉妒这一个整体，他们都在那么重要的岗位上战斗。

一生也没那个机会了。已经错过了。但是不能怪自己，我自己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1976年7月4日

为了把工作搞好，必须练一练风琴（幼儿园工作需要风琴伴奏）。

这么作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是，把时间恰当地安排一下是很能多学些知识的。晚上下了班，做完家务事，吃了饭，练半个小时风琴（我母亲在金刚碑小学教音乐课，能支配风琴，这时已放暑假，而且生产队、大队排练和演出节目，历来都是借用小学的风琴，因此假期中风琴经常放在我们家里），然后就可以看书了。

没福气进大学的人，也可以学习，这就是在实践中，在斗争中学。高尔基不是有一本《我的大学》吗！

1976年7月5日

（1974年上级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决定“就近下乡”，以大队为单位设立知青农场，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分管。1975年红光公社各大队普遍建起知青农场，我们大队的起名“金刚知青农场”，知青来自附近的西南农学院、仪表四厂、仪表八厂、二十二中、北碚防疫站、北碚供销社、煤矿工人疗养院等。首批来了20多名，全盛时期达到73名，实际常住的有50多名。杨远明作为副书记分管。金刚知青农场的最后一批知青下乡时间为1978年8月，以附近的煤矿工人疗养院职工子弟为主，他们把户口办来了，人却没有来，杨远明并不认识他们。两个月后的10月份取消知青下乡政策，农场的青年全部返城，知青农场消亡。）

今天同知青王洪亚谈了一阵。他刚满17岁不久，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

我们大队的知青农场问题很多，他们特别气愤的是工分问题。男女生的工分没有区别，普遍现象是男生觉得受压。本来女生是比不上男生的，但女生中最弱的也跟王洪亚的工分一样高。这小伙子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他每天晚上看守山林，几乎每晚上都要捉住偷砍树、竹的人（社员都不愿意去看守山林，不想得罪熟人）。他说他很想下队，不愿在农场。

1976年7月6日 夜一时

刚才从广播里得知朱德去世了，治丧委员会是毛主席主持。现在我们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接班人的问题，提上了首位……

1976年7月7日

今天下雨不上班，我跑到西师去了。如愿以偿，顺利地找到了罗朝贵。她是一个热情爽快的姑娘，马上就给我介绍她的学习生活情况。

我急于想搞清楚，现在的大学生跟文革前的大学生到底有什么不同。罗朝贵说，现在学工、学农的时间很多，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很多。上层建筑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此，她的学习倒放到次要位置去了。学外语，对毫无基础的人来说，非常吃力。每天上课要想记住单词，整得头昏眼花。但是她说业务主要在实践中学，今后到了工作岗位，边工作边自学，也来得及（后来她被分配到市二十三中学，地点在附近的澄江镇）。

我想，文革前的17年，大学生是攻尖端，爬小宝塔，极力脱离工农的。而现在的大学生，却是肩负着革命的重担，工农阶级的委托，参加教育制度的改革的。他们的方向是向着工厂农村。他们学的主要是正确的政治观点，而业务却是次要的，是可以在斗争实践中边教边学的。

罗朝贵对我们的情况也知道得很多，她有时词句尖刻地突然说出一句什么来，弄得我很难回答，因为平时我对这些问题考虑得很少。

她请我吃了午饭，送我出了校门，并告诉我今后多去玩。

1976年7月11日

以前我挣工分很积极，甚至不要命。但是后来明白了，挣工分不过是谋生的手段，没有其他意义，所以我对工分就不那么注重了。在基本生活能够保证，一般地说日子过得下去的情况下（也就是不至于饿死冻死），为什么要为了不值钱的工分卖命呢！

但是，凡是需要我去做的，绝不推辞。如像照夜，以前照夜盘算有多少分，现在想到应该尽自己的责任。

在农村中，许多人看问题都是从实际利益出发，他们愿意在烈日下汗流浹背地担煤（担下河炭），却不愿为集体利益照夜。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列宁回忆录》

1976年7月17日

有好几个人提醒我要注意婚姻问题。他们说：“是时候了，年龄不小了。”确

实，我已快满 25 岁，已经不小了（我在当时已经是典型的大龄剩女，而理想的婚姻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恋爱在心中燃起烈火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应该老成稳重些了。而且，我要想办的事连一件也没成功，怎么能分心呢！

所以，这些人表示关心也罢，表示要帮忙也罢，我都以客气而冷淡的态度应付了事（后来很被动地相过一次亲。男方是农村的，小伙子没出现，他的长辈亲友一共四人到我们队来看了我，当面没表示态度。之后给介绍人回话，说我是知青，靠不住，算了）。

1976 年 7 月 18 日

“作家要尊重自己的内心”，说的是思想感情的问题。一个人的内心到底想的是啥？这个作家的作品是属于他自己，还是力求为政治服务？

许多人谈起现在报刊上发表的小说不感人，感染力不强，除了这些读者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问题，还有作品本身的缺点。有的人说这些作品的技巧不高，但有的人说这些作品技巧不错。那么，感染力不强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一般地说来，就是作者“内心”的问题。要感动人家，首先得自己感动。如果自己不感动，是不能感染别人的。……作家的世界观改造得不好，他笔下的英雄形象不真实，这是一方面。读者的世界观改造得不好，不欣赏无产阶级的艺术，他们同这些作品格格不入，这是另一方面……（写了一大段感想）

1976 年 7 月 21 日

我认为结婚是束缚自己的手脚。

有人说：“结婚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增加一个得力的帮手。一个好的妻子应该是丈夫坚定不移的伴侣。”

滚他的吧！现实生活中，妻子成为绊脚石的比成为帮手的多得多。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丈夫对事业十分热忱的前提下。反之，丈夫是妻子的阻力的也多的是。……现在的夫妻，一般都没有什么事业心。据我所知，上班为了钱，下班忙家务，闲时研究什么好吃，什么好穿，这样的家庭占多数。不管年轻人的好胜、好学、上进心多强，只要一结了婚，家庭便占有了他绝大部分精力，孩子便成了他精神的寄托，从这时起，他就未老先衰，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小圈子里了。所以马克思说：“对于一个有宏伟抱负的人来说，最大的蠢事莫过于结婚。”

1976 年 7 月 22 日

自从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社、大队、小队之间的产值比重以后，我们大队就让四个生产队上交了所有的副业。昨天，为这

些副业的问题在大队会议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还请来了公社江书记，也没有解决问题。今天，队里的几个小干部不上班，在家里写什么大字报，反对江书记的某些做法。

具体什么问题我没有搞清楚，也不能乱插嘴发问。加之现在我也不愿意管这些事，就没有去打听。

1976年7月23日

高尔基的《母亲》写得真是深刻……（一大段抄录和感想）

1976年7月24日

似乎对政治活动已感到厌烦了。我希望静静地、受自己意志支配地学一点东西。

心里萌起这样一种念头，在我来说5年来还是第一次。

1976年7月29日

晚上政治夜校学习，冯炳友来给我们上课，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专题……

今天下午在北碚担酒浆（北碚嘉陵江对岸的制药五厂经常有制药后剩下的粮食残渣，黄浆、酒渣、酒浆等，让附近农民轮流去担。这些残渣在正常年景是猪饲料，饥荒时期当粮食吃，掺入青菜叶子和泡咸菜，味道还不错，我自己多次吃过，能够解决附近农村缺粮的燃眉之急。我亲眼所见，曾经为了抢酒渣，几个队的农民打得头破血流），队长梁万华在烈日下晒了整整一天，晒得背脊和脖子冒油。但他自己绝不多担一点。后来由于别队捣乱，秩序很乱，梁万华的左胸被打得青紫了一大块。（为了避免更激烈的矛盾）他走开了，却还是在远处耽心地观望着，看我们队的人到底担到没有。说实话，这种踏实肯干，不谋私利的干部，就是他搞一点工分挂帅，人们也能原谅，因为他品质是好的。他没有和群众成为对立的阶级，同志间的关系没有成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1976年7月31日

今天下午收获很大。我到李子林去找李书记盖章，又到冯炳友那里去找他借了他的宣讲材料，他很慷慨地借给我了。然后我又到彭纯才那里去坐了一会儿。……

我仍然决定按照自己选定的道路走下去。即使在私生活上吃大亏也在所不惜。

1976年8月13日

自从大队硬把各生产队的副业收去之后，各队都一律陷入了穷困。我们队穷得精光。以前每三个月烧两窑砖，收入是每窑一千多元。还有粮食加工厂，每月也有好几百元的收入。现在这两项收入没有了。几个月了，生产队只借支过一次，数目很少，我们家好像只有4元钱。平时社员借支总是被出纳一句话“没有钱”挡了回来。

这样一来，担下河煤的多了。叶光全当队长那几年（四清运动之前），队里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担，大家衣袋里经常有零钱。但是现在看吧，一串串担着箩筐跑得飞快。乌黑的赤脚，棕色的背和胳膊，肩头磨得发红，有的还破了皮。头上是赤日炎炎，额上是汗珠滚滚。男人们的短裤绞得出水，女人的衣服都贴在身上。从早上三点多钟到晚上天黑尽，我家对面的石板路上川流不息地走着这样的人。

担煤炭也分等级。生产队的社员，担来的钱要交一半给生产队，每一元两角钱买10分（“10分”指工分，因为要在生产队里领取基本口粮，大概每人每天为6或7两原粮，另外还有工分粮等等）。大队基建队的社员要用两元钱才能买得10分。还有一些下野力的，他们的收入不再交给谁，全都自己得（“下野力”指自己外出干活挣钱，不能在生产队分基本口粮）。

后来许多人找到了窍门，去跟下野力的搭伙，担的钱不再交给谁，都自己装腰包。但是干部们的锐利眼光马上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们制订了各种制度，要强迫人们守法。人们是很灵敏的，马上找到了更巧妙的方法，躲过了干部的检查。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社员们连称盐买火柴的钱都没有，更不用说买衣服了。腊月里还得买粮食度荒。

大多数干部在这方面好像是不成问题的。大队副队长常常在酒馆里坐着，他很明显地发胖了。去年像排骨架子似的脊背，今年长满了肉，走起路来还发抖。大队书记苍白的皮肤使人很怀疑他是农民。这些是掌握政策的人们，他们老是催促生产队长检查社员们担了多少钱，老是定出制度来管、卡社员们。

生产队副业收归大队所有是路线错误。毛主席说：“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逐步改变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三级比重，只能由大队、公社新建小型企业来改变，绝对不应该用没收小集体副业的方法来改变。事实上，伤害小集体，使小集体的资本主义放任自流，而大队副业又处于停顿状态，几个砖瓦厂的工人都跑光了，他们宁愿去担煤解决家庭困难。

没收小集体副业，同时也使副业大权集于少数人之手，毛病百出。为饲料，为劳力安排，常常搞得不团结……

两年建成大寨式公社，不容易啊，因为路走偏了。

1976年8月14日

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演员是一个重要因素。

今晚在疗养院看《难忘的战斗》，我觉得田文中这个英雄典型比其他影片中的英雄典型更完美……（一大段观后感）

1976年8月16日

这次由担煤引起的危机还没有过去。星期六开社员大会，队长强调指出一定要扣（基本口粮），但是结果并没有执行。据说还要将这个问题交社员讨论。

结果只能是两个：一、队长要敢于反潮流，不怕得罪干部，将私自割草卖的一起强行处理（私自割草卖的全都是干部家属）。二，全都放开不管，睁只眼闭只眼，让它过去算了。

1976年8月17日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也是社会上一切矛盾的集中表现。要想正确地反映社会，必须将一切社会因素弄清楚。作为在社会里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更是不能不弄清楚。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就处处注意本队、本大队的政治斗争了。

1976年8月18日

电影《难忘的战斗》中的插曲，它的主调也正是这支歌的基调，这是一首激动人心的歌……（一大段观后感）

1976年8月19日

同时我还看了长篇小说《黄海红哨》，变荒岛为铁碉堡的过程。这本书使我想起了《海上南泥湾》那支歌：“蓝蓝的海水青青的岛，高高的山峰白云绕……”（一大段感慨）

1976年8月21日

昨晚上到左开云家里去耍，一会儿王庆也来了。我们不由自主地辩论起来，题目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没有剥削？会不会产生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

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掩盖了微量的剥削，如八级工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王庆用报纸上的词句来解决这些问题。左开云滑得像条泥鳅。
我们的声音可不小，别人以为我们在吵架。

1976年8月25日

今晚上在十八梯听小明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专题。他不但讲的肤浅，甚至还反动。他离开了党内走资派这个目标，把矛头对准群众，专讲些什么“担下河煤是资产阶级”、“扩大自留地是资产阶级”、“鸡啄地（住房周围经常被鸡啄的地方，集体种植的作物长不起来，社员便开垦来种些东西）是资产阶级”。甚至“如果明天有人偷了谷子，大家不能不闻不问。”还有什么“干部分了霉包谷给社员，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

1976年8月31日

今天是暑假最后一天。幼儿园有5个孩子要去上小学了。最近几天我带他们到北碚公园、自然博物馆去游览一番（没钱乘车，我带着他们沿公路步行，往返共约六、七公里。因为信息闭塞，第一次去博物馆遇上闭馆休息，很失望，垂头丧气地走回来。第二次又去。我要求孩子们在公路上排成队，唱着歌，但是他们不习惯也不听我的，乱七八糟。第二次回来时走过了团山堡后，只得让他们自己一窝蜂跑了，幸好公路上汽车不多，没出什么事），作为他们幼年生活的最后纪念，还买了铅笔送给他们。

孩子是要长大的，他们每天在增长知识。

我呢，决心将23年的信念彻底推翻，在探索中摸出新的道路来。

“世上本来是没有路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是从荆棘丛中开出来的。”

如果我舍弃了物质利益，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一辈子，却又仅仅是为了谋生，不是太不值得了吗？

毛主席说文艺有两个标准，一个政治的标准，一个艺术的标准。政治的标准很清楚，“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就是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艺术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知道了。没有谁能清楚地指出艺术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艺术？我十分不懂。

1976年9月2日

半年前我对幼儿园又烦又懒，现在呢，我发现我对孩子们很有感情。虽然每天在呵斥他们，甚至打骂（所谓幼儿园，没有任何设施，没有食物，连开水都没有。而且农村孩子个性非常野，我全靠一张嘴，不得已时要对个别的打两下屁股。家长们支持我打骂，他们自己比我打得还狠）。

物质是基础，精神是主导，如果忽略了人的因素，那光谈“物质第一性”毫无意义。精神对于物质基础的反作用是强大的。例如这次唐山大地震，如果不是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那地震带来的灾难将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根据政治学习宣传材料得来的印象）。

1976年9月4日

今天在公社学习。中午吃过了饭，没事做，我就去找公社宣传队的熟人玩。刚巧谌永学跟周老师在一起研究乐谱（周老师是北碚文化馆的老师，北方人，大块头，外号“周大汉”，负责辅导群众文艺活动，总是背着个手风琴到处跑，走到哪里就响起歌声和笑声，所以知名度极高。直到2010年代，高龄了，还是热情奔放，见到愿意听的人就立马高歌一曲。经过周老师的辅导，有一年我们大队宣传队在公社文艺汇演中得了第一名）。

谌永学招呼我说：“来坐吧！”

周老师说：“来来，我们一起来斟酌一下。”他问我：“你平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农业机械化要通过哪些措施才能实现？”我说：“以前考虑过的，首先需要平整土地。”他说：“对，这就是‘人造平原连千里’。这比喻你觉得确切不确切？”我只好一笑：“当然确切。”他问：“然后呢？”他自问自答：“人造平原连千里，这是远景，近看的话，麦浪翻滚，水渠纵横。”他又自言自语：“水渠纵横，已是别人用过好久的话了。现在我写成这样：金桥上面走银河。”我问：“怎么是金桥上面走银河呢？应该是银河上面架金桥呀！”他笑道：“正是这样，渡槽呀！”我也笑了。谌永学插进来说：“架，这个字不妥当。这个词儿应该是动词。”我说：“这样行不行？‘金桥飞架渡银河’。”周老师说：“可以。”

然后周老师说：“我设计了一个节目，名叫《插秧赛》。说的是有两个小伙子不服气，要跟插秧机比赛一下，结果累得浑身骨头快要散架，也没赢。别人就拍着他们的肩膀告诉他们：‘小伙伴呀小伙伴，机械化道路多宽阔。放眼望，祖国壮丽的锦绣山河，人造平原连千里，人造喜雨平地落，稻浪层层起波浪，金桥飞架渡银河。收割机，云中走，机器欢唱人欢歌。机械化道路多宽阔，人民公社奇迹多。’”

我听得张开嘴笑，谌永学偷偷向我伸了一下大拇指。

后来我跟何三谈得正起劲，忽然一个民兵小分队的人来说，金刚大队金刚生产队的副队长偷了木料，足足有解放牌卡车半卡车，这人姓蒋。我一听就知道是蒋队长几年前的事情败露了（实际上是蒋队长的儿子犯事，他偷木料是为了卖钱）。

1976年9月5日

梁万华决定对担煤炭的人实行镇压（不得已而为之，担煤炭、找其他门路挣钱的人多了，没人干农活，上级也施加压力）。凡是被领导所知道的担了煤炭的人，要求他自己将钱交出来，如果自己交，在生产队扣钱20元。

本来造成担煤炭——资本主义放任自流——的原因是大队收去了各生产队的副业。对于这一点，梁万华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去顶。对社员，他利用权力，能镇压的就镇压。这种因果倒置，而又蛮横不讲理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错了，我也错到底，我管得了社员，就要管！”他还说：“对干部待遇，应该承认有差别，这有什么办法，不在我职权范围以内。”（这些认识和想法，都是党员干部培训时被灌输的。）

公社干部拿月薪，社员饿得半死，跟公社干部的实际收入关系不大。所以干部们着急也可，不着急也可。他跟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这种法权再扩大下去，中国的特权阶层可就要日益垄断国民经济，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事实上现在社会生产力不能发展，正是这个原因。陈永贵说得好：共产党应该组织群众生产与生活，如果党的干部只是发号施令，不参加劳动，那么他会变成与群众对立的阶级的。

今早上我去找书记请示工作，他说了一句话：“现在各种斗争的反映都离不开物质利益。”（以前说的是“离不开阶级斗争”。）

偷，是为了物质利益，担煤炭，也是为了钱，干部扩大法权，也是为了物质享受。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物质利益的占有，连阶级斗争也是这样。

1976年9月6日

（给我提意见的人说，我的小说手法是自然主义的）说到“自然主义”，什么是自然主义呢？这就是客观地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自然。以前我理解为按照客观进程的发展将事情反映出来，这是不对的。因为自然主义的作品并不包括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应该是“完全客观的”。

似乎现在“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作家已经失踪了。

1976年9月8日

“艺术就是形象”。如果一篇小说或叙事诗成了“理论的抽象”，它所表现的人物只是一堆偶像，其结果一定是读者不爱看。

今天团支部在缙云寺搞活动，安排不够紧凑，但我还是很快乐的。跟天真纯洁的青年在一起，可以暂时忘掉尘世的利害纷争。我们在狮子峰搞了纳新活动，

还搞了“击鼓传花”。不过我一支歌也没有唱。

1976年9月9日

噩耗总是突如其来，毛泽东逝世……。 (我写了一大段感慨，又写了一首长诗，表达悲痛的感情。)

(“四人帮”垮台好多天后，我们都不知道。在坡上挖土时，有一个消息灵通的人谈到“党中央又出大事了”，被一个女团干部大声呵斥“不许造谣！”那人悻悻地回嘴说：“事情已经都出了，我们不知道而已……”与几年前的林彪事件一样，打倒“四人帮”似乎与我们无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激起一点浪花。因为20多年来，不停地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感觉上已经迟钝，除了四清运动外，都与农民没有直接关系。)

1976年11月19日

再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 (一大段观后感)

1976年11月28日

看了电影《江水滔滔》…… (一大段观后感)

1976年12月6日

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又一次使我感动得掉泪…… (一大段读后感)

1976年12月17日

因事到西师去，没有找到赵老师和陈老师，就到西师幼儿园去游览一番。

我发现了城乡之间、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鸿沟。

农村幼儿园是一个多么原始的单细胞啊！社员们为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为孩子们每个月交出的5分（5个工分）而互相争吵，打架。没有孩子的社员因为无权享受这一项福利而骂街。而每一个社员劳累一天才得5角钱！

西师这些高级文化机关，儿童受到全体教职员工的爱护，每月交上8元钱和定量粮到幼儿园，可以吃够、喝足，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完善的设备。

这跟农村儿童在粪堆灰堆里打滚是鲜明的对照。跟饥饿的农村儿童也是鲜明的对照。从人格来说人们应该是平等的，可是从现实来说，却是等级森严的。

我们（官方授予我们“幼教工作者”的头衔）的任务是填平这道鸿沟吗？可笑！

我感到这道鸿沟的填平必须来一个革命，不是所谓的造反、革命，而是要尽力发展生产……

1976年12月28日

除旧岁，迎新春，1977年马上来到了。

我现在的处世策略是：什么人都去接近接近，什么人都去观察观察，择其善者而从之。

罗世模是一个客观的、看问题很具体的人。我从他那儿能学到很多东西。例如大队喷漆厂，现在的干部们只考虑自己孩子们的出路，照现在这样的办法是不可能办得红火的。有的人又专从干部的方式上找毛病。罗世模的看法就不同，他认为，喷漆厂要给队里增加收入，而且是新办起来，就必须要有有一个骨干核心力量，首先在人选问题上，要选转业军人，有朝气有能力的年轻人，能真正为贫下中农谋福利。

罗世模爱说“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这些“讲”，都是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

1976年12月29日

昨晚上床以后，将大队喷漆厂的成立经过又反复想了好久。目前领导上营私舞弊，把喷漆厂看成一个安顿亲属子女的好地方，所以无论怎样不成材的小孩子也去了，其思想基础、劳动观点之差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依罗世模所想，把喷漆厂看成一个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才、增加社员收入的副业工厂来对待，那么在人选问题上就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选那些能够担当责任、踏实工作的同志去，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

“后门”是一个危害建设、涣散思想的东西，它会像蛀虫一样，悄悄咬去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1977年元月3日

几千年阶级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三大差别……文化大革命试图给消灭差别开辟一条道路，看来没有达到目的。文化大革命使真正的农民大批进入高等学校，对文化教育形成冲击和放松，使科学文化停滞不前。后果只能是国民经济的落后，阻碍社会发展。……也许有人指斥我这是“打击贫农”，但我得先告诉他：农民必须承认自己落后，而且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克服这种落后。如果老是照顾农民情绪，不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那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对所有阶层都是不利的……哪怕农村中一小部分人爬上去，他们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也是

不行的。

要“举贤才”，只能通过考试，只能在考题的选择上下功夫。

1977年1月4日

今天（到河对岸制药五厂）担酒糟，又一次看清了两极分化和等级差别。

混乱不堪的局面，乌七八糟的场合，越诚实的人就越吃亏。到最后，在一片谩骂声和埋怨声中，混乱局面不了了之。黑夜已经笼罩了大地，人们又累又饿，离家还有十多里路。

这时，最有权势的干部及其随从们搭上拖拉机跑了。次一等的干部及其随从们找来板车拉上酒糟走了。再次一点的人饿着肚子担上酒糟走路。最后的人只分得很少一点酒糟，大家一起摸黑回家。

1977年1月6日

昨天我到知青农场去还书，顺便了解一下知青们的思想状况。

知青农场办得不好。年轻人的作用完全发挥不出来。粮食亩产下降，麦苗都是些黄苗苗。菜园里的蔬菜像野菜一样，他们吃咸菜的日子很多。黑板报和墙报是一个多月前出的，字迹潦草，不太慎重。

粮食减产他们是不怕的。首先国家要给他们补足420斤（每年），其次是收获的粮食交给生产队，核算之后分配给农场，基本口粮跟社员是一样多的。其中还有四个生产队是拉平了来算的。最后，有父母作坚强后盾，没有一个知青不靠家庭支援。

劳动时，有带队干部或贫下中农社员督促，一般不偷懒。如果没有“大人”在场，光是靠这些小孩们自我教育，就大有戏看：自觉的不迟到不早退，踏踏实实。不自觉的，上班半小时后才拖着锄头来到地里，而且没人敢批评。如果谁不知趣非要出嘴，那他在其他方面就一定要吃亏。

懒惰与放任是不怕的，只要父母亲戚当了干部，迟早是要调出去的。两三年后就是拿工资的工人，现在何必吃大苦呢！一个科长的女儿，厂里已来调了三次，因她锻炼还不满两年，农村有权利扣留她。

父母亲戚没当干部的怎么办呢？混下去吧。别人都调走了，总有一天轮到我。不过表现太差是不行的，后台不硬的人必须自觉遵守纪律。

金刚知青农场，总的来看还比较平静，青年们每天上班下班，担水洗衣，小的摩擦打架断不了，大的事故没发生。劳动时有“大人”带着，菜园里有专门小组经管，“成绩是主流”。他们总算在农村坚持下来了。

但是，其中的矛盾细细分析不得，想来问题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知识

青年到农村，到底是干什么的？

1977年1月8日

……大队喷漆厂选了16名到仪表厂去学技术。由于指导思想不正确，这16名还没正式拜师的青年，就开始争福利、闹待遇了。

没能去的像矮了一头，去了的人的主要注意力不在工作上。

1977年1月14日

我经历了第三次上大学的推荐（推荐别人上大学）。这一次我没有申请，做了一个旁观者。俗话说：“旁观者清”，确实是这样。

现在，上大学的名额很少，只相当于总人口的几万分之一。现在的推荐情况是：要有两个基础，一是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能够经过几级推荐，这就是只能是当干部的，不当干部不经管一些事情就不可能有影响。什么人才有条件当干部是不言而喻的，当干部的条件是其父母创造的。第二是在各级领导的心目中有印象。这有两条路可走，用钱买，即开后门塞包袱，或者用工作成绩。工作成绩能够在干部心目中刻下记号的，也只有人事关系极好的才可能。

由此可见，有权当官，有钱买后门，是两个必要的条件，缺一不可。

1977年1月15日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再三告诫我们要理解现存经济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很有可能变成私有制……（一大段抄录及感想）

1977年1月16日

伍姐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她的态度不卑不亢，话语不即不离，对人亲热又马上可以转为冷淡，聪明的眼睛老是洞察周围的事物。她老是很冷静的、细心打量她周围的人。这样的人决不冒失，别人冒犯了她，也会马上遭到报复。

如果不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上大学呢？

事实上，在她父亲的问题解决之后，她是母亲用钱从农村买回来的。如果她像我那样（有父母花钱买前途），定会少吃许多亏。

1977年1月17日

我有些怀疑我现在的学习方法。这样下去究竟会有什么收效。这种方法脱离

实际，学了无用。我得赶快完成这一阶段，即语法入门，好早日开始学历史，再学文学史。（1976年秋，我曾找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名儒曹慕樊先生学知识，我父亲生前与他是中文系同事。他这时还是“右派”，在西师扫厕所。他让我和另外一个女孩，晚饭后到他家去，每周两三次，还有他的小孙子，三个年轻人听他讲唐诗绝句。那是我终身难忘的幸福时光，也是曹先生黑暗岁月里的幸福时光。后来师母悄悄告诉我，每次给我们讲过之后曹先生都因激动而失眠，而大清早又得从事惩罚性劳动，他身体受不了，不能再让他讲了。师母身体也极差，常年卧病。于是我借口生产队事情忙，不能再来了。曹先生感到惋惜和难过。他给了我两本语法基础知识的书，我说这些学了没什么用，曹先生笑笑说，今后总会用上的。）

看来以前的想法又错了。学习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而是一件艰苦的事。我费了好大力还不能掌握语法基础知识，更谈不上灵活运用。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1977年1月18日

昨天开社员大会，公布了超支户。

今年真是很反常。对某些人的高喊口号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一月下旬快到了，分配方案还没批下来，不但领不到钱，连粮（返销粮和救济粮）也买不到。大多数社员缺粮，许多人靠借粮过日子。

还好，我家虽然很紧张，还不至于像去年那样断顿（自1974至1975年继父罹患胃癌去世，我家经济濒于绝境，春荒时几乎饿死，全靠两个舅舅和姨妈经常性地接济才撑过来。1977年虽有好转，但仍然处于饥饿中）。

方案批不下来的原因，主要是超支户。其中最大的超支户就是生产队长梁万华和大队书记。分别超支一百多元、近三百元。他们平时借用太多。他们找出纳，说一句话就能借到钱。

今年全队超支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四十一，是金刚队有历史以来超支户最多的一年。他们交不出钱来，收钱户就收不成。如果队里硬要他们交钱，他们就望着最大的两户——队长和大队书记，看这两户怎么说。这两户自然是拖下去。

我们队里一年两年是变不过来的，就像脓疮一样，脓不除干净，伤口始终长不好。领导班子四分五裂，软懒散，互相争夺，互相包庇。社员冷眼旁观，做活儿磨洋工，仿佛上班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干部。

拼命干了一年，却拿不到血汗钱，甚至还要倒补几十元的多的是。钱都流到谁的腰包里去了呢？查账，工作组，不起什么作用。

我是多么希望离开这个地方！青青的山，绿绿的树，涛涛的江水，这个地方

是美丽的，是值得留恋的，可是在这里连饭也吃不饱，整天憋着气。

送生父离开人间的时候，我不能明白父亲对于我的意义；送继父离开人间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我的命运越来越坏的又一转折点。在人生道路上，我走的是一条阴暗坎坷的小路。

借用鲁迅无题一首：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1977年1月19日

（我呆不下去，决心寻找出走之路）王亚文的话是对的。她说如果出走，得有个目的，不能盲目地游览一阵，一无所获，又回来。

先从湖北下手（湖北有我的三舅舅一家，对我们非常好，一直从经济上帮助我们）。一有机会就打听湖北。

我的力量一是无处可用，二是助纣为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977年1月20日

在北碚看了电影《周总理永垂不朽》。（写一大段观后感）

昨天下午队里给每个人分了6斤左右包谷。这是这个月分的第二次。

工干家属（丈夫是工人或干部的妇女）一律不分。结果已经断粮的一群妇女围着队长又哭又闹。梁万华气得脸孔发紫。这些人骂他在队里借钱太多，骂他给别人（指大队书记）批借款单的时候不讲原则，骂他利用职权压制群众……

今年的政策是，补钱户无论多少，都要钱交齐了才分粮。但是（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家的人都把粮食分走了，群众更气愤。今天上午一个姓曾的妇女，找到队长哭，反被队长训了一顿。

1977年1月21日

昨天上午区里来干部帮助解决了许多问题，总结了去年一年的情况。应该说这个会解决问题是不彻底的，提出问题也不深刻，只片面性和表面化地研究了粮食问题。区上的干部答应帮助解决粮食问题，仅仅是答应。昨天下午开了社员大会，向社员公布了分配情况，安排今天担渣肥。又在昨天晚上研究了补助困难户，还发了收钱户总数百分之五十的年终饷。

今天上午全队热气腾腾地担渣肥。由队长和副队长带领，人们穿一件单衣，头顶上热呼呼地冒气，担着堆得尖溜溜的两筐渣肥，爬上笔陡的坡去。

面貌变不变，根本在路线，关键是干部。今早两位领导一带头，全体社员，

事实上是一半的社员，但这也很少见了，很久没见过这种情况了——都跟着去了。
不管怎么说，今天这种场面还是鼓舞人心的。

1977年1月22日

有一个问题使我不解：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富裕的道路里是否有剥削？……或者所谓“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要让一些人占便宜？

1977年1月23日

今天队里放假。占全队半数以上的人户，都四出买粮。

杨忠秀和刘光惠在澄江镇买了几十斤搭伙券（本地粮票），没有粮本（只有城镇人口才有粮本，按照人口定量配给）她们回家的路上遇上我正朝山花石走，杨忠秀就死赖着我，要搭我的粮本（我母亲和弟弟的粮本）买10斤米。我就让她搭了。

（右图：继父去世后，孙丹年全家合影，前排母亲和弟弟，后排孙丹年姐妹。）

一出粮店碰上邓明芬和邓泽芳（邓明芬是我们同院子住的关系挺好的邻居），邓明芬拿着20斤全国粮票没有粮本，也来借我的。我说刚才粮本上才批了



10斤，马上又去批，工作人员不会卖的。邓明芬好说歹说，要去碰碰运气，虽然我担心粮本被没收，但还是借给她了。果然工作人员不卖给她，还清问粮本是借的谁的。我在一旁真着急（怕粮本被没收）。邓明芬好说歹说，最后还是卖给她了。搭了百分之四十的玉米。

听说今天街上的小腊肉瘦得很。

前天何嬢嬢告诉我，她们街道上两弟兄，父母是被镇压死的，他俩是孤儿。现在两弟兄二十多岁了，没有工作，做零工得点钱，节省得什么似的，生怕没零工做了饿饭。就这样还是常常没有工作。他俩一碰上知心的朋友就哭一场，有时别人也周济一点。但是没有人肯帮助他们找工作。他们这种情况，人家不敢帮忙。

疗养院的熊某，父亲是长征老干部。她从小娇养得什么似的。下了农村，根本不上班。几个月后就调出去了，在仪表厂，还当了分管青年工作的基层干部。

据说她娇气到什么程度呢？有 30 来步上坡，坡度大些，她就累得爬不上去（空着手，什么也没担），细声细气地说：“好累呀，真难走！”

凭良心说，那两弟兄比熊某有用十倍。这样的革命后代，对社会发展，只能起阻碍作用。

1977 年 1 月 25 日

刚才从二十二中回来。我和王亚文每次都展开专题讨论。我们的看法和意见也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对待事物的态度。我对不合理的现象十分气愤，她却泰然处之：“这是一个历史阶段，要慢慢来！”

不知为什么，近几次深夜我单独从二十二中回来，有点胆战心惊。树影黑黝黝的，耳朵里响着另外一人的脚步声，竟有点疑神疑鬼了。以前从来不这样（确实有个年龄比我小几岁的小伙子跟着我，是个惯偷，脚步轻得跟猫似的，他跟着我走，但没有恶意，仅仅是想告诉我一件事，而我自己还不知道。后来他告诉我：我的一个笔记本掉了，是抄录的唐诗宋词和其他杂乱内容，被团支委兼宣传队长的某人拾得，交给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又交给一个有点政治地位的、下农村蹲点的老师，请他评价。这位老师说，这个笔记本主要记的是古典诗词，说不上反动。但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抄录这些诗词的人是个黑五类子女，说不定有一些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意思在里面。这时已临近改革开放，人们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弦”松弛多了，这事就不了了之。最后我找书记把笔记本要回来了，现在还保存着）。

我常常想，将来我是不会在这里的，虽然我从小在这里长大，这里却不是我的家乡。亲人吗？亲人们跟我一起在这里受罪。没什么可留恋的。

1977 年 1 月 26 日

昨天晚上在王亚文那里看到了英国大诗人雪莱的名作《钦契》，这是一个悲剧脚本。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爱得深，写出来才动人（发了一大段感慨）。

1977 年 1 月 28 日

看了黄梅戏电影《红霞万朵》。（一大段观后感）

1977 年 2 月 1 日

今年是个好年景，因为下了两天大雪，“瑞雪兆丰年”。

29 号那天，一开门，便见玉砌银装，漫天皆白，那雪片还飞舞着往下掉，纷纷扬扬，盖住整个世界。李白的“燕山雪片大如席”，以前我总想象不出是个

什么形象，现在才算看见了。

下雪是好事，是奇景，可也造成灾难。十点钟左右，房上边的树桠枝便压断了两枝，一枝掉在窗前，一枝重重的落在房上，压碎了几匹瓦。等到化雪时，滴滴答答的就漏了下来。

我活了 25 岁，第一次看见白天下雪，又第一次看见雪盖得这么深。我到二十二中去了回来，“踏雪而行”，那雪下了有半尺厚，一踏下去，埋没了脚脖子，鞋里灌满了，滑溜溜的，“咕咕”作响。万分小心，还是免不了摔个跟头，坐到雪上。幸而雪厚了，衣服没打脏，沾上些雪，化了以后湿漉漉的。

1977 年想来是会好的，因为有了好的预兆。人的因素暂且不谈他，单这气候，这季节，就不会差。1972 年初下了一场大雪，那一年不是丰收吗？小春特别好，大春也不错，红苕简直吃不赢，粮食增产很多。

今天看《政治经济学讲义》，谈到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一大段抄录及感想）

电影《毛主席永垂不朽》，使人心情激动……

1977 年 2 月 2 日

我在《红楼梦》里看到了奴隶阶级的分化。有向上升为奴隶主的，有向下落入乞丐的。“大观园里没有真正的奴隶反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奴隶反抗。”（这本《红楼梦》残缺不全，由此《红楼梦》留给我的永远是一些局部印象。）

“求人者常畏人，受人求者常骄人”。求人真难啊！为了买北泉面（北泉挂面，当时是赠送佳品，很难买），到处看脸色，碰钉子……

1977 年 2 月 3 日

电影《车轮滚滚》……（一大段观后感）

《山村新人》不真实，它跟“四人帮”定的调子一样，避开了现实生活，离开了物质世界，用空洞的阶级斗争，用精神感化来教育人们，难怪人们不愿看。有些青年说：“我不愿受你那教育！”……（一大段观后感）

1977 年 2 月 5 日

在疗养院看《洪湖赤卫队》……（一大段观后感）

1977 年 2 月 6 日

外婆病倒一个星期了。我在家里忙得晕头转向。到晚上觉得很累，比上班累的多。

家务事是很讨厌的一种工作，它耗去人的精力，却看不见成绩。即使有了成绩，也没有价值。这就可以想象，一个人，特别是妇女，整天在家里转，过上几年，她的眼界，她的思想，会局限在一个多么狭小的圈子里，度过的一生是多么可怜！

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家务的折磨中白了头发，昏花了眼睛。

我们知识青年也将这样了此一生吗？在现阶段的农村，这是摆脱不了的命运。

再过5年，我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看见花残，便葬花而哭，说“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只有自杀……但我现在仍然看见多少劳动妇女，她们珍惜自己的青春，但她们的青春在繁重的劳动下消退得很快，只不过她们没时间自赏，没时间哭罢了。

1977年2月7日

今天罗二娃掉到池塘里去了（罗二娃大约5岁，是罗世模的宝贝儿子，是我的幼儿园学生。这天二娃跟在我身边走，他为了什么事情不满，耍横，大声嚎哭。他被家长宠坏了，在家里耍横司空见惯，全队的人也都知道，我也没当回事。我俩沿着池塘边沿走，没想到二娃是闭着眼睛在嚎，突然就跌到水里去了）。幸好是在水浅的这一头（赶紧把他拉上来），如果在水深的那一头，我还得脱了衣服下去救他（这事我要负很大的责任，罗世模一家很通情达理，完全没有责备我。这事成为笑谈。而我，作为幼儿园老师，很内疚）。

1977年2月8日

还有十天过年了。外婆的病老不好……今天弟弟也睡下了，高烧，满面通红。

我常常想，得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但是一来时间紧，二来也没有好老师指教。

我小学的几个女同学，她们上班、家务、孩子，再也没有精力做其他的。将来我也到她们那步田地，再想抽出精力来学别的，是不可能的。别人的经验教训，自己该引以为戒才是。

如果当农民，我肯定不会是好农民；如果当家庭主妇，我更不是好主妇。我是一个不务实际、充满幻想的庸人，终归庸碌终身，一事无成。

但我愿意这样，而不愿当一个好主妇。

1977年2月9日

非常高兴，因为在疗养院看了电影《秘密图纸》……看见田华，就想起了喜儿，多久能再看一次《白毛女》就好了。《白毛女》得过世界奖的，“四人帮”却将其打入冷宫，现在也该解放出来了。

（这一时期我家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父患病去世导致的经济亏空还没缓过来，我家的三个农村户口，即我、妹妹、外婆，完全没有粮食了。最困难的时候，我拿着5元钱，到粮票交易很活跃的澄江镇黑市，去买了7斤黑市粮票，每斤粮票7角钱。靠这几斤黑市粮票支持了好几天，直到生产队出面到外地购买了一车红苕回来分给大家。幸好外婆做饭很能计划，有好多天我们的晚饭没有主食，外婆每晚切下一小块腊肉，那是我们自己辛苦养的猪杀了腌的腊肉，省着吃，要吃大半年，用腊肉混合着牛皮菜、白菜煮。后来腊肉没有了，就用腊骨头，开始还放一点点玉米面，后来玉米面也没有了，只有菜和一小块腊肉或骨头，熬出来一大锅，汤是黑色的。这样吃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每到下半夜就趴在床沿上吐黑水。2002年左右，渝中区政协征集文革的文史稿件，我写了这一段亲身经历，文史委主任看了不相信，说：“哪里有这种事，吃了牛皮菜，半夜吐黑水！”我不想争辩，晦明不提朝露，夏虫不与语冰。经历不同，很难互相沟通理解。）

1977年2月10日

这两天为幼儿园，我装了一肚子闷气。

现时的农村经济，负担不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开头因为幼儿园的工分要摊在社员身上，又有人说幼儿园用去了三百多元，其实只用了180元左右（有个给小班婴儿取暖的小烤火炉，用了队里的煤炭，另外给婴儿买了少量必需品，偶尔也给每个孩子发一颗糖），社员们议论纷纷，吵的吵，骂的骂，风言风语很多。队委会上就有人提出幼儿园应减少人员（一共三人，我管3至6岁的孩子，要教唱歌跳舞识字，另两个妇女管婴儿，负责喂奶喂饭换尿布）。队长不同意，没有减少人，但是风言风语更多了。这风一吹到我们三个保育员耳朵里，我们三个心里都有气，工作上就懒了些，加上现在气候太冷，小孩子有一半也不常来，社员们就找妇女队长和书记提，说我们工作不负责，孩子又少，等等。

昨天的社员大会我没参加，王书记在会上点我的名，问我幼儿园还有多少个小孩，说要减少一个人。

今天我知道了，很气愤。认为：如果领导上要撤掉幼儿园，或是抽走一个人，应该先调查研究，作了解决，再向社员公布。哪有先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再作调查的？

由此可见领导的水平之差，也不定他成心跟我过不去。本来我想中午去找他谈的，但中午他家的门闭着，大约他不在家。

说实话，在幼儿园蹲着，虽闲一点（看起来比重体力劳动轻松），却多费脑筋，又听闲话，受气。别的生产队的幼儿园垮得差不多了，就只有我们这一个幼儿园还没垮，看来也不容易办长久。为什么呢？因为条件差，办得好与坏，仅仅在于保育员的责任心与业务水平。而在农村来说，这两个条件都不容易具备。物质条件更不用说了，小孩子的第一需要是吃，可是我们连开水也没能预备。真是见鬼！

我将诗词丢开好久了。连一些名诗，原来记得，现在也忘了。“三天不练手艺人”，学文艺的人不记诗词可不行。《红楼梦》里的诗写得好……（一大段议论）

小明吞针，和着馒头一起吃下去的。知青农场那些天棒（性格暴躁的男知青）弄他去打了一顿（怀疑他偷了知青的胶靴，那段时间分管知青农场的副书记杨远明到另一个大队交流锻炼去了，否则事情不会发展得这么严重），工作组硬逼他交出贼赃来，回家来哥哥打他骂他，才十几岁的小孩子，受不得几处逼迫，就寻了绝路，吞针，送往医院去了。

别人都说小明的胶靴是买的，有人帮他带回来的，装靴子的盒子还让那人得了。可有人硬说他是偷来的，还追问同伙有谁，工作组天天弄去盘问，他这一吞针，他妈妈哭得什么似的，书记还不信，说：“我才不信他会吞针！那东西怎么吞得下去？说来吓人罢了！说他偷靴子倒是事实！”但是书记处理另一件案子（一个强奸案，但不知真假）又不同了，不闻不问，推故不知……

1977年2月11日

工作组的4个人在十八梯被社员围住了。先是小明（因受冤枉吞针自杀未遂）的哥哥和二婶找组长，要他签字，找队里借钱（交小明的住院费），同时夹七夹八，要他们解决处理小明吞针的问题。说这是被逼自杀，工作组应该负责。因为小明被拉上知青农场去的时候，被绑，被打，关了三天三夜，还是彭纯才说了几句好话，才放回来的。回来时脸都肿了。而且他根本没有参与偷胶靴的行为，纯是冤枉。

工作组4个人把二婶那张嘴（这位二婶的嘴非常厉害，俗称“说话像吐枇杷籽儿一样”）奈不何，严光才又来了。严光才说：“这事要热炒热卖，时间久了就无人管了。”工作组老王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就提出另一件强奸案来，说老王偏护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偏护亲戚，官官相护，不给解决。把老王气得发抖。吴组长也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围着看的群众越来越多，恰恰又休息时间到了，人们从山坡上都跑下来

看。同情心都倾向两家受害者。等工作组 4 个人走的时候，那位二婶破口大骂，说工作组跟大队党支部互推责任，这骂的话他们也听见了，一齐回头瞧了瞧，才又灰溜溜地走了。一个女社员说：“骂得好！”另一个男的说：“这些工作组，大事做不成，小事做得好！”（小事，在此处是暗指收受贿赂。）

据我看，这是党的威信在群众中丧失了的表现。（一段议论）

1977 年 2 月 12 日

幼儿园的工作使我感到恼火。因为近来气候冷，孩子们长了冻疮，家长也不常上班，许多就不爱来了。加上学校放寒假，幼儿园里大一点健康一点的孩子都跟着放假的学生跑了，满坡遍野地跑，如果我硬要追他们到十八梯来，那么学生们也跟来了，光捣乱，课也不能好好上。

社员们意见还多。本来幼儿园占用了社员们的钱，坡上干活时议论纷纷，甚至借此出气的，借故骂人的，无所不有。现在又说我们烧了瓦厂的煤，孩子还是长冻疮，又说我们不负责，孩子跑掉了也不找回来，等等。

我装了一肚子闷气，下午开社员大会时找大队妇女主任反映。妇女主任说全公社的情况都差不多，连梅花大队的许多幼儿园也垮掉了。但上级仍然叫坚持办下去，不能垮，垮了的也要重新组织起来。公社妇联采取了一些措施，大约要像斑竹岩队那样，无论孩子到不到幼儿园来，都要扣家长的工分。如果真要那样的话，我的工作倒还要好做些，因为有了一股上面来的压力，这股压力能推动工作。

但话又说回来，幼儿园托儿所状况的根本好转，还在农业生产状况根本好转之后，后者是条件。

明天在梅花中学，全公社召开批判大会，批判人贩子。这一向宣判和游街的罪犯都很多。但是对人贩子，我始终还有点不相信。人贩子只不过是个中间人，我们这里的女子和他乡的男子才是主要因素。我们这里地方不好，女子们愿意外出，他乡的男子也愿意接受她们，要想有效的阻止人们外出，也只有在生产状况根本好转之后。难道能挡住人们外出吗？好像现在还不可能。

我就想到外地去。

1977 年 2 月 13 日

晚上在疗养院看电影，第一部是《第二个春天》，第二部是《平原游击队》，是 1955 年出的老片子。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片子看着能感动人呢？因为它真实。……

1977 年 2 月 16 日

《甲午风云》……当邓世昌悲壮地举剑走向船头，号召全船士兵和敌人拼一死战的时候，当他们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而被敌人的鱼雷击沉的时候，全场肃然，无不英勇的前辈所感动，为清政府的腐败激怒！……（一大段议论）

回家路上一个小伙子说：“这些电影有什么不可以看的？岂有此理，禁闭了这么多年！”

上次朱老师讲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大任务：一、镇压敌人；二、改造小生产；三、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力。现在的生产落后，我终于找到了原因：一、把改造小生产列入镇压敌人一类，扩大了打击面，制造了混乱；二、形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无人管理生产，即使有人抓生产也抓得不好。

导致生产力停滞不前。生产问题终归是政治问题、领导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新的剥削者，这一新形成的阶级不消除，生产力就始终受阻碍。

由什么人来作领导力量呢？看来还得清官斗贪官啊！群众的呼声倒是次要的。

1977年2月17日

昨晚看了《甲午风云》，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半夜睡不着。……（观后感长达4页）

1977年2月21日

在蓝海那里看到一本《中国近代史》，看到了甲午战争，那次海战，跟电影上反映的差不多，我把它抄在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牢牢地记下来了。可惜那个本子后来被扒手当成钱包偷去了，那本子还是五年前彭纯才送给我的呢！

宋培培在初二晚上搞来两张《东方红》电影票给我们，在运输电影院看。第二天上午我们又买到三张票，又看了一次。这部影片有三千多人参加创作演出，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搞出来的……（一大段观后感）

1977年2月22日

私人哀怨何足谈
江山衰败落叶残
若得枝头新芽吐
万紫千红春又来
昂首待春情不尽
报春喜鹊天外还

1977年2月23日

如果我留在这里，我的命运就跟几个小学的女同学一样，喂猪，煮饭，上班，家务，一直到死。广播上管这样的生活叫“扎根农村干革命”，我可要管这种生活叫“历史的倒退”。这只是国家经济困难无法解决这么多人的职业和吃饭问题，才把这些青年送到农村去，让他们用原始落后的方式自食其力。同时也从反面证明了我国大工业的不发达，安置不了这么些产业后备军。

但是目前我的出路在哪里？很难说。跑到外乡去吗？结果可能更糟，仍然摆脱不了当家庭奴隶的命运。以前认识不清楚。现在我希望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经济上必须自立。所以现在我就尽力争取这一点。哪怕是到新疆去呢！

1977年2月24日

前天上午到二十二中去，跟成莉娟谈到《甲午风云》，她说：“清政府腐败，打不赢人家，现在的政治还不是同样腐败，江青就是最大的卖国贼，我们的国防力量也打不赢人家。”

这话初听时使我吃了一惊（江青虽然被打倒了，还未审判，余威还在）。细想来确实是这样，在我日见耳闻的范围内确是很腐败的。

今天我自动退出了幼儿园。果树组正缺人，那里更需要我。虽然没经过领导批准，梁万华却一言不发，等于默认了。因此幼儿园也就从今天起正式垮台了。小班的婴儿仍由一个妇女带着，她也有牢骚。

今早上听见广播里批判“四人帮”，说“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把赤脚医生捧那么高，把专业医生踩下去，动不动就抬出“新生事物”的牌子来压人，把人们的怨言吓回去。幼儿园不正是这样吗？初建时轰轰烈烈，众人捧柴火焰高，等到各种矛盾暴露出来难以维持，领导上就用“新生事物谁敢拆台”来唬人。到现在，各大队的大班都垮得差不多了，领导上也不表态了，任其自然。

什么事情都不能只看表面，而要看背后，看本质。构成一件事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个主要矛盾是不是自己能够克服的，才能决定自己处理这件事的策略。

1977年2月26日

我自动退出幼儿园是很及时的。继续维持下去，所有的怨言、怒气和谩骂就会对着我们几个保育员来了。我们拆散了幼儿园，使怨言无形中消失，领导上无暇顾及追查责任。为了怕承担责任，领导上不表态，就是想把我们几个保育员推上矛盾的尖端，他们乐得看笑话。

现在我多少比从前聪明些了。如果硬着头皮顶下去，实在是个大傻瓜。我们自动退出，选的时机也很合适，在过年以后。

有孩子的社员有些惋惜，而绝大多数社员对幼儿园的垮台很称心。

如果要追责任，就要追及那个不同意用公益金作幼儿园开支的人。幼儿园开支由社员工分值摊，这是不合乎政策的。早知这样，当初轰轰烈烈成立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以免今日垮台时难堪。

我发现，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还是要有足够的基础知识才看得懂，像我这样，只相当于小学资格的人，差了初中、高中整整6年的教育，来看（翻译过来的）马列原著，真比啃石头还难。（这段时期，从左开云那里借来了砖头一样厚的《资本论》，早已知道“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儿”，是马克思主义全部论述的基点，《资本论》是经典中的经典。非常虔诚地打开，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啃。每一个字都看了的。其中有些举例像讲故事，能看懂，但能够理解的内容，跟整本书的逻辑分析是脱节的，所以总的来说完全不懂。然后再看了一遍。就是说，我把《资本论》通读了两遍，也算见识了什么叫“马克思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明白了“剩余价值学说”长的是这个样子。）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看了三分之一，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经验批判主义”。满本的名词搞得我昏头胀脑，最后就放下不看了。

所以，我认为教育仍然应该是宝塔形的，应该经历小学、中学、大学这样一个历程，最后进入社会踏上工作岗位。

1977年4月27日

昨天，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接受了生产队出纳的工作。

没有推托的余地，何况也提不出任何充分的理由来拒绝。对于爱好文学的人，将要出入于财经世界，确实不是什么好差使。在收入与支出的大海里，很可能被复杂的票据、数目字弄得昏头昏脑，不知所措。

但我还是有信心的。出纳、会计等工作是管理与统计生产的职能，先得要把各种概念弄清楚，使自己免于被动，然后一切按财务规则办，勤勉谨慎，尽量做到不差、不错。

“天生我才必有用”，过去曾被弃置不用，还感到愤慨，感到委屈。现在自己面前打开了另一扇门，入门以后，需要学习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我要尽最大努力，来掌握这一领域的知识，好好为全队的贫下中农服务。

今天跟着梁万华到街上跑了一天。梁万华寡言少语，心地善良，他说：“你

先跟我去熟悉情况，把各单位的办事处摸清。”

梁队长是一队之长，春耕大忙季节，领着我这个代理出纳到处奔走，我感到很惭愧。原任出纳不辞而别，忽然远走高飞（远嫁到福建），丢下一摊子事务，梁万华替代了两个多星期，未办清的手续、票证很多，我刚接手，又一窍不通，只好给梁队长增加负担。

出师不利，第一次出去结账就碰了钉子。养路段跟我们生产队在半年前定了一个口头上的合同：一个很大的柏油池，需要把柏油舀干，讲定了四角钱一桶，完工后结账。这个合同仅仅是口头的。我们把柏油池舀干了，一共 248 桶，该得 99 元 2 角钱。谁知我们今天一去，养路段的财务人员硬说当初讲定的是三角钱一桶，只该得 74 元 4 角，白扣掉 24 元 8 角。

这还不算，当我们准备开发票时，他们又说我们这一本现金凭据是集体所有制适用，全民所有制单位不适用的，要我们用“公社工副业”的发票开。那种发票只有公社一级才有，生产队一级没有那种发票。他又要我们到税务所去开发票。

这可难办。从它那里出来后，梁队长说，这是全区性的规定，目的在限制“五匠”（木、石、铁、泥瓦、篾等工匠）盲目外出。如果农村“五匠”盲目外出做工，那他就得不到工钱。普通生产队用的凭据不能对外生效，只能农村中互相使用。税务所和“公社工副业”发票只对经批准外出的“五匠”生效。

梁队长还说，这种规定不是绝对的。有的单位急于完工，非到农村招临时工不可，即使公社不批准也顾不得了，那时生产队的发票就有用了。今天这种情况，除了国家规定的一方面外，我们跟这位财务人员交情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不熟，他要打我们的官腔。不过，养路段找生产队替他们拆除一个毁坏的油锅炉，我们也可以打他的官腔，拖下去不给他拆。

至于这笔钱什么时候再去交涉，梁队长说我们不要着急，为拆旧油锅的事，这位财务人员会自己找上门来，我们再和他讲。

今后我可得吸取教训：一、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的，必须多方面考虑，谨慎又谨慎。二、办手续时要摸清来龙去脉，要卡死，例如讲合同，就得书面的，以免后来反悔。

再说，这种禁止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政策我很怀疑，光是形式上的禁止，收效并不大。禁止劳力外出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堵死自发的资本主义；二、集中力量抓粮食生产。这种形式上的限制，只能起到限制人们生产热情的作用，何苦呢？

1977 年 4 月 29 日

办移交手续那天，我望着三张移交表格直发愣。在场的有梁队长、生产队会

计，和原任出纳的母亲。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交给我的到底是些什么。手里拿着一大把发票、便条，很怀疑他们在这里面搞了什么名堂。

昨天晚上，公社王会计、大队张会计、生产队刘会计、公社基建队叶书记、大队出纳睢某、原任出纳的母亲，加上我，一共七人，在梁队长家里，重新审查移交手续。

公社王会计、大队张会计、叶书记，是有名的算盘高手，是财经大师。出于高度的责任感，鉴于原任出纳不在场，他们认为应该把账目彻底弄清楚，将原任出纳的单据支票全部封存起来，万一今后出现问题，将不牵涉新出纳，账目也清楚。王会计还指出：新出纳李丹年（当时我跟继父姓李，后来上大学才改还原姓孙）一窍不通，头脑一团混沌，经他们审查后，新出纳的头脑会清醒得多。

王会计大概有四十挂零的年纪，视力很差，将账本移到鼻尖下，仿佛不是在用眼睛看，而是用鼻子闻。他说话风趣，关心时事，将我们的瞌睡都赶走了。

查账从八点继续到半夜十二点。将移交项目中所有的复杂混乱都去掉了。我接到的，只是三张存折。这说明一切都将从头开始，我只对自己经手的事情负责。

十一点半时下起了雷阵雨，我们冒雨摸黑回家。王会计和张会计就在生产队住了。

回家后我清理现金和票据。昨天下午生产队用了一千一百元给社员预支。我用了将近三个小时，光在十多个数目字上打转，算盘敲过来又响过去，一直到脑袋快要爆炸，预支名单上的数字跟现金还是对不上号。妈妈和外婆警告我，快到凌晨三点钟了，我只好关灯上床，望着帐顶，半天睡不着。

今早上六点钟醒来，衣裳没来得及穿，就有人来要领钱。来的是新上任的生产队农业队长。这位队长近 50 岁了。（听说）他解放前是赶马车跑生意的，后来给队里赶牛车，几年间和另外两个人合伙贪污了一千多元钱，此后多年精神不振。这次当上副队长，没经过群众选举，是他当大队干部的妹夫硬把他抬上来的。他阅历丰富，头脑灵活，见人态度很好。

他拿出三张发票来报账。我看发票手续周到，一共 14 多元钱。但是我手里只有现金 12 元 6 角，不够啊。他说：“那，随便什么时候给我都行，没关系的。”我犹豫了一下说，先领其中两张的，余下一张你拿回去，过几天再来领。他却很通融地说：“用不着麻烦，你收下好了，随便什么时候给我都行，难道我还不相信你？”

我就收下了，拿钱给他。他盖私章时，盖在数目字上面，我先是感到奇怪，后来明白了他是怕别人涂改数目字。

他现在差队里 20 多元钱，其中 6 元不符合财务手续。因为这是上届出纳的事，尽管群众意见很大，我也不必过问（按规定他今天拿来的发票应该冲抵欠款）。

这位队长走了以后，我又着手清理昨晚上没算清的账，一下子就算对了，现金跟账目一分钱不差。我自己惊奇得几乎不敢相信。鬼才知道是怎么的，我早就说过我不是搞财务工作的料。说不定就是这笔账目，再算一遍又会错的。将来准会掏腰包赔钱。但愿不要赔得太多，以免丹平跟我拼命。

我想起了恩格斯说的：“我用6个办事员组成一个管理部门，可以比用60个政府顾问官组织的要精简实用一千倍……”而且，恩格斯还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有军人的风度和气概，又是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几乎精通全欧洲所有的语言、方言和土话。最为伟大的，使他的名字永放光辉的，还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不朽功勋。

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兼有这么多才能的？

下午上班挖土。相处了好几年的果树组的人对我任出纳都很关心。岂止他们，26号，就是梁队长到我家来的那一天，许多人见到我就露出微笑。原任出纳的哥哥，在含义深长的一笑之后说：“我妹妹再不会当这名堂了……现在队里财务制度混乱得很，不好当啊！”

徐某也远远地笑着说：“嘿，新出纳，你要注意点啊！”我问：“注意什么？”他说：“不要头上长刺呀！”这含有讽刺意味的玩笑，使我想起了两年前。那时继父刚去世，我自己由于幼稚顶撞了干部，记工员被除掉了。还传出许多话，说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伪装积极，骗取领导信任等等。这些令人难忘的事件，让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果树组的气氛是融洽的、热闹的。十来个组员之间基本上没有隔阂和利害冲突，闹点小毛病免不了，但基本利益一致。其中刘小模29岁，我12岁时就认识他了，那时他16岁。我们几个经常一起上山拣柴、打猪草，比较熟悉。他老是阴沉沉的，性格阴郁，脾气古怪，很不逗人喜欢。他家里很贫苦，年过六旬的老母亲，两个小孩，一共5人，饱受饥寒之苦，几乎一年到头都吃清汤玉米糊糊，有时菜里不放盐，因为没钱买盐。他说：“去年梁万华刚当队长时，我去借钱，基本上不打官腔，后来就变了。今年春节前，我耳朵旁长了疮，肿得很，又很痛，在床上起不来，我叫我妈去借三块钱，找到梁队长，求爹爹告奶奶，说了半天也不答应。后来我婆娘（老婆）去找他一哭一吵，才同意了一块钱。这是要医病哪！”

可是我现在手里的借条有十多张，梁队长借钱33元，杨队长6元，还有一些。这些条子根本不是借条，只是一些墨条，或称便条。既没盖私章，又没经谁审批，只有“某某在出纳处借钱多少元，年月日”。这是原任出纳借给他们的。社员意见很大，生产情绪很受影响。

这些便条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我心里没个数。经他这一说倒有些怕了。万一

这些便条今后人家不承认，怎么办？这是非正式手续借钱，何况又是在大多数社员连烧煤钱盐巴钱都缺的时候。刘小模又告诉我，队里经济账很复杂，要是很容易上当。例如，某甲交账给某乙，乙不懂，糊里糊涂的接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账上有一笔款没兑现，差现金 80 多元。乙去问甲，甲不承认，说交账时没出问题。乙大哭，请了大队张会计和叶书记，查了几天才查清了，甲被迫承认，赔了钱。这种例子很多，财经世界屡见不鲜。

小模这一说，我倒想起了，昨晚上在梁队长家，大队出纳也在场。本来并没她什么事，她在这种场合出现，不是偶然的。原来，三年前她是生产队出纳，现在的大队书记当时兼任（大队）出纳。有一次，她找兼任（大队）出纳的书记借了 200 元，当时出具了一张借条。过了一个月，她将 200 元现金还给书记，却忘了取回借条。现在，三年之后，书记拿着那张借条找她要账来了，说：“既然你还了钱，为什么借条还在我这里呢？可见你没还钱。”两人大吵，直到今天还在扯皮。昨晚上她就是来找各位会计出主意的。其实这没什么主意好出，照章办事，200 元该她赔。

小模还说，要是不机灵点，不仔细点，人家就会栽赃到你头上。现在生产队财金混乱，书记差钱达 700 多元，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移一点到你头上，你又不了解，又说不出口，只好掏腰包赔。他出主意说：“你去找梁队长，要求订出规章制度，你好照章办事。”又叹口气说：“要是真正照章办事，得罪了那些人，你就要被踢开了。”他还说：“前几年我们到北碚为生产队装煤，中午在饭馆吃了饭，大家马上算账，摊钱摊粮票，心里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外出干了活儿，吃了饭，没人记账，我不知道自己该摊多少。到了年终决算才在自己账上发现一笔钱粮。谁知道他给你写了多少？说不定花了 5 角，他给你写上一块钱。”

我说那倒不会，这点制度还是有的。小模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哼！知人知面不知心。”

下班回家后，我把听来的话告诉家里人，妈妈叫我不要乱说。好在今天只有我跟小模，他说话比较谨慎，在人多的场合他是不开腔的。

这几天区委派来的工作组在大队查账，专门组织了 7 人查账小组，已经一个多月了，据说还要连续查 10 天。已查出的结果：书记连正在打官司的 200 元在内，一共差钱 700 多元现金；副书记差一百多元；杨书记差 70 多元，但其中有他帮别人借的 67 元，他自己只差 5 元，当场掏腰包补了，还办了手续；最干净的是张会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这段时间，他账上只错了一元七角，马上掏腰包补了。

梁队长告诉我，大队财务，在 1972、1973、1974 年间，拿钱不依手续，大家都是干部，自己写条子自己拿钱。混乱不堪还互相埋怨，看谁挪用最多。

1977年4月30日

我跟梁万华上街为队里办粮（办返销粮的手续，之后再派人或让社员们自己去运回来）。他走路比我快，我要迈开大步才能跟上。他经常是一言不发，闷着头，我也闷头跟在后面。望着他那粗壮憨实的背影，昨天对他的怨恨消失了。我很了解他。

梁万华是个孤儿，4岁时父母双亡。他本来是我们生产队的人，他家屋基还在。父母死后姐姐把他接去，寄人篱下，养成了他沉默倔强的性格。据说他小时候就不爱说话，但内心感受却很强烈。长大后肩宽背厚，敦敦实实，是个强劳力。农活也都熟悉，犁田打耙，栽秧拔谷，什么都会。20多岁了要结婚，老在姐姐家不行，又无自己修房子的财力，就搬回我们生产队，由队里找了一间破烂无用的保管室，他自己修修补补，搭个草棚做厨房，成了家。

他来队里的那年，正是我办户口下乡那年。那时我以为他爱人是他妹妹，还打听从哪里搬来这么两兄妹。家底薄，爱人多病，多年来梁万华一直是困难户。两个孩子体质也单薄，尤其是小女儿长期生病，医了几年才治好。他爱人嘴里爱唠叨，他是个闷葫芦，心里烦了免不了要打爱人几下。一到没粮吃或缺钱用，两口子就要打架，我还劝过一次。

梁万华是个正派人，社员都相信他。他回到队里第二年当了科研组长，当时科研组连我在内只有三个人。三年后，科研组合并于果树组，他当组长，那时队里不重视果树，开一次会，他发一次脾气，如果队长不理他，他转身就走了，懒得跟你紧说。再后来他当了大队贫协主席，去年当了生产队长。

梁万华是我的老上级，他的脾气我熟悉透了。由于领导能力欠缺，没口才，开会没话讲，生产队实权在书记手里，他只作为一杆枪用。书记叫他如何，他就如何。有一次，书记叫他去开会，他发了牛脾气，不去，也不理睬。书记在马路上嘶声哇气的喊，后来冒火了骂他：“你有你妈个毛病！你这个党员不当，就给我搁倒！”一听这话，本来就一肚子气的梁万华，跳起来回敬：“我就有这个毛病！你要哪个？老子今天就不去开会，你把我吃了！”

我们都掩着嘴笑。

由于家庭困难，缺粮缺钱，他当队长以后，免不了在队里挪用几个钱。后来渐渐胆大，一用就是几十元。他本来连年超支，这一下账上有了250多元，根本还不清。公社每年发救济款，给他评个20、30元是常事。这就激起了社员的反对。去年下半年以来，常有人背后骂他，骂他乱用队里的钱，还要得补助。他爱人听不得，上班跟人吵架，他也很恼火，有时就不想当这个队长。

这么一个人，决不是坏人，决不是如刘小模所说那么坏。

今天中午我和他办了粮回来，12点半才到家。一到家，他担上箩筐去担烧炭，叫我下午两点去他家。我回家吃了午饭，休息了一会，两点钟准时到他家。他儿子说爸爸还没回来。将近三点钟他回来了，担了130斤煤，满脸乌黑，满身大汗，洗了手脸才端饭吃。我看他吃的是两碗清汤包谷羹羹（玉米糊糊）和几块咸菜，那点东西，我吃了也不够，更不用说他这么大块头。

所以，后来我说刘小模：“你不要光说梁万华，说别个都很容易。就是你当了队长，手里有了点权，也免不了要挪用点钱。”小模承认我说得对。

杨队长的女儿写个便条，没经队长批准，也没盖私章，到原任出纳那里借了30元钱。（但是她这么做是有理由的）队里要买五千斤包谷。在这个农活大忙季节，五千斤包谷如果抽50个男劳力去担，就不合算。她丈夫答应给队里联系个解放牌汽车。包谷拉回来了，连司机带中介人，请他们饱饱吃了一顿酒饭，外带烟茶，油盐钱还是杨队长垫的。这些钱粮由队里报销。所以，如果将来杨队长女儿到我这里借钱，也不能阻挡。

1977年5月1日

面对这些问题，我很想申明制度照章办事，但心里却明白这是行不通的。也犯不着得罪干部。两年前当记工员，当得坦率耿直，那后果就够瞧了。不光革了职，还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这个李丹年想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革职事小，防政治陷害事大。

我去问叶书记。叶书记跟我们是邻居，墙壁挨着墙壁。他20多岁就当大队书记，四清运动中被整得差点自杀。后来没事了，再当记工员、会计、队长，上调公社官复原职，又当大队支部书记，位置相当重要。他担任金刚队队长那几年，是金刚队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工分值高达一元，全区闻名。我把梁万华乱挪用钱的经过告诉他。他说：“你顶了他也没用。问题在于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做。我再告诉你一次：你的责任，是照手续付钱收钱。至于那钱为什么收为什么付，只要知道内情，懂得道理就行了。去改变潮流，不是自己份内的事情。”

今天上午，堆石队的拖拉机帮我们队运回了包谷。我押车回队，梁队长留在北碚，叫司机卸车后再去北碚。卸车后我准备回家，杨队长叫住我，问我化肥开了（提单）没有，我说没有开，因为梁队长没发话。杨队长说，他没发话你也得去，明天等着要。这几天天气好，坡上的包谷苗薅了要施肥。我回答说下午再去。杨队长却叫我马上就跟着拖拉机去，梁队长还在街上等他呢。

我想了想，现在上街的话，我挎包里背的是集体的钱，我自己一分钱一两粮票都没有。我得吃午饭啊。我就回答说：“我现在不去，我回家吃了饭再去，请

李司机到北碚见了梁队长告诉一声，叫他下午两点在北碚花台等我。”

徐某在一旁打趣说：“嘿，你这个人，北碚没饭吃，要你家里才有饭吃！”一转身，他又说：“大家都促成你上街去，你就去嘛！队长在北碚等司机喝酒，你也去消灭几块肉嚙！”

我很没好气，冷笑一声。

下午去北碚，果然见梁万华、王队长、李司机，以及三个不认识的人，在煤栈工人老熊家喝酒，喝得脸红脖子粗，舌头打绞，疯疯癫癫的。梁队长顺手给王队长批了5元借款条子，叫我付钱。

今天五一节，太阳很好，为了赶季节，队里没放假，大家都在薅包谷、淋包谷，顶着太阳流着汗。而我们的领导却毫无必要地醉醺醺。

晚饭后，我要交化肥提单，去找梁队长。在他家，见他醉醺醺地躺在床上像条死猪，他女人正在吵闹，没好气地回答我说：“他不在家，他要死了！他一出去就是一天，喝了牛尿回来挺尸！我一天忙到黑，猪草也没人打，包谷也没人去分回来，饭也没人煮，娃儿饿得哭……”她突然提高了声音：“你个打短命的！我吵你几句，别人还说我不对……呜——”

我连忙劝她不要吵。但是梁万华丝毫不受她的感染，他早习以为常了，还嘿嘿地笑。我很为他的女人难过。我说：“梁万华，不是我说你，你不对！”他回答：“我那点不对？我今天又没得工分！”我说：“没得工分是另一回事，你今天很没必要去喝一下午酒。家里和生产队这么多事情没人管。”他嘿嘿地笑。

今年初，大队贫协和工作组联名打报告给公社，要求把叶光全调回金刚大队来。这是全大队一千三百多名社员的殷切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成了泡影。

1972、1973年叶光全在我们生产队当队长，他头脑清楚，责任心强，又有苦干精神。那时常常加夜班，他亲自带头，修堰塘，担早粪。要是碰上担瓦炭那几天，他总是叫我去发瓦炭。我们住隔壁，他半夜两点多钟就来叫我。我那时才20岁，瞌睡多，听见他喊，穿衣起床，昏头昏脑地跟他走。出门风一吹，揉几下眼睛，才清醒过来。他就叫我去敲钟，他到杨家湾（听不见钟声的地方）去叫人。然后我跟他一道走，他还说：“丹年，要是每天早上你出门担一挑煤炭，保证活一百岁！”（现在我60多岁了，每天早上出门锻炼，在清晨的黑暗中，经常想起他这句话）1972年是我们队最光彩的一年，全区农业队的工分值都只有四、五角，可是我们（达到7角多），关饷时，我家三个劳动力（继父、我、妹妹。妹妹刚下乡只有半年）领到了550元。最多的一家有一千多元。那时谁不高兴？那几年小伙子结婚都容易得多

社员起早贪黑地干，工分猛增起来。为了控制工分增加，缩小劳强户和劳弱

户的差别，他绞尽脑汁。每次社员大会矛盾都充分暴露，他让大家发言，免不了吵个天昏地黑，最后由他来收场。他能够把握关键性的东西。

对财金制度他带头遵守，还经常督促检查。他本人当过会计（能够双手同时打算盘，在人声鼎沸的场合，也完全不受干扰），账目发票精通，什么弊病也瞒不过他。领导风气正，社员也不违反制度。

叶光全当队长，大队顶头上司却跟他过不去。叶队长经常加班，早上担了早粪才参加开会，工分自然多一点。顶头上司就到公社反映，说叶队长利用职权多写工分，要求扣除他的工分。为这事闹得满城风雨，我们大家都为叶队长抱不平。

后来叶光全调去公社，与他原来的顶头上司官职相当平起平坐了，但矛盾还是免不了。这次他不能回大队来，就是因为这个。

叶光全一走，我们队的工分值由 8 角跌下 6 角，再跌下 4 角，一年比一年差。

1977 年 5 月 3 日

昨天我到大队出纳那儿去结账，看见一张巴掌大的便条，是三个月前某人（此处不宜直说名字）写的，向大队借钱 500 元。我问：“巴掌大一张条子也是 500 元啊？要是搞丢了，这 500 元不是算到自己头上吗！”

在现金流水账上，我尽量做到一分钱不差。但是在票据、借条和专章问题上，那就难说了，万一今后差了呢？

1977 年 7 月 28 日

7 月 22 日那天，中午正热的时候，×书记突然把我从午梦中叫醒。他要开砖二千疋，叫我拿凭证给他（即他不交钱，我先给票）。这位书记在经济账上的乌七八糟众所周知。当天，为了 840 元钱，他在二十二中参加学习班。

我有些担心地问：“钱呢？”他急火火的，说：“钱我明天就拿来。是这么回事，粮站的刘庭杰叫我替他开十码砖（每码 200 疋），今天下午车子就要来装货。但是钱他还没给我，明天给我了就给你送来。这个你放心，先把发票给我，等会儿车来了就要提货。”

我犹豫了一下，把发票开给他了。他在发票第二联的背后签了名，说：“明天我把钱交来了，由我来划掉这行字。我们照手续办事。”

下午我到砖瓦厂去，问管事的：“刘庭杰的车装砖来了吗？”他摇摇头说：“不晓得这回事。今天没车来。”我知道事情奇怪，就找到队长梁万华，把这事讲给他听。梁万华说：“人家刘庭杰的砖钱早就交给×书记的。你不该把发票开给他，这事做错了。”我说：“不开给他，他认为你一个小小的出纳，连书记都信不过。”梁万华笑笑没开腔。

今天罗世模知道这事后，批评我：“丹年你做事不负责任。没见钱怎能开凭据？公事公办嘛！”我申辩了一句，他又说：“哼！你怕得罪了×书记，以后穿小鞋，调不了工作！”这话真是一针见血，我急忙说明：“我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幼稚。”罗世模将×书记以往如何骗人骗钱的事讲给我听了，说：“这84元砖钱，你快去问他要，说不定能得到，否则，今年一年也不会给你，你掏腰包！”

旁边一个小伙子说：“书记人家的，怎会干这种事？”罗世模说：“这种事还少吗！他干这种事已是老手了。你听他把丹年哄到鼓里蒙着，这钱他一年也不会拿。要是今年决算他没钱收，还说不定拖上几年呢！”

我决定用各种方法迫使他交来这笔钱。既然是书记，总还是爱面子的，这就是他的弱点。

1977年8月3日

跟×书记那笔84元的悬账，满坡都知道了（所有在坡上千活的人都知道）。特别是果树组的人，更讲得起劲。大家一致认为：赶紧问他要，否则时间长了出问题。

星期六那天早上，我担水的时候到他家去了（当时伏旱，到处都断水了，×书记家前面的一处田角有水渗出来，我去那里舀水）。他女儿在家，说父亲还没起床。我就叫了几声“×书记”，他在蚊帐里答应，听声音是被我惊醒的，大概他反应很快，一下子就知道了是谁在叫，并且明白了这个人是为什事来的。他说：“星期三，下个星期三，刘庭杰就送钱来。”

我说：“快拿钱来，七月份完了，我要跟会计结账呢！”他说：“一定一定！”

今天已经星期三了，现在是晚上9点钟，他没送钱来。那么明天早上我再跑一趟。

我将这事告诉人家的时候，有些对×书记恨得要命的人，就怂恿我将这事告到工作组去。我心里自有主张，还不肯将×书记得罪得过火，因此不会到工作组去。这步棋留到最后来走。

1977年8月5日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结尾说：“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话说得多么痛心，因为当时马克思断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是绝不会听从他的意见的。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为了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增加一份必不可少的宝藏，马克思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部不朽的著作。

而现在，我要想拯救一下自己的灵魂，却是那么不容易……（一大段联想和感慨）

1977年8月12日

昨天晚上上下大雨，穿屋而过的阴沟被泥沙填满了，大水从屋当中涌出来，鞋、凳子、板盖等家具什物都像船一样的漂，墙有泡软了倒塌的危险，那景象真吓人。房子外面一团漆黑，偶尔被闪电照得雪亮，雷声震动大地，风刮得呜呜的响。（继父在世时都是他来领头处理这种事，现在继父不在了，母亲和外婆帮不上忙）我和丹平、弟弟忙了半夜，勉强把大水排出屋外。今天屋里还一团糟。

请了尹贤明和何二娃来帮助把阴沟翻盖了一下。

1977年8月18日

×书记交来那笔钱后，我才了解到事情的内幕。原来，上次到公社开会，我跟刘远明一路，我把这事讲给刘远明听了。刘远明是查账组的成员，他回去讲给萧德全听了。

萧德全是个责任感很强很可靠的人，他觉得这是查账组的责任，便拉上刘远明到北碚去找刘庭杰。刘远明开头不愿去，认为这跟查账组无关。但经不住萧德全动员，两人便一起去了。刘庭杰当然告诉他们——钱是早已交给×书记了的。

后来×书记就来交了84元钱。

1977年8月19日

今天×书记在二十二中查账组办公室里，点头承认了800元挪用，并且签了字盖了章。

据说，查账开始的第一天，他拍了桌子拍胸膛，赌咒发誓说自己完全没挪用。但是现在要退下手表来交给拍卖行了。

1977年8月23日

昨天街上游行，庆祝“十一届党代会”召开。

“十一大”提出了八项具体任务……看华主席、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的能耐了。

1977年8月24日

下午上班，摘口袋虫（果树上挂着的昆虫的蛹）。单独跟杨大庆在一起摘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我们队最后一名挂靠亲戚的知青，年龄十七八岁）。以前没接近过他，听说他跟几个妇女在一起怎么怎么的，很瞧不起他。但是一接近，谈论思想看法，觉得这小伙子很单纯，思想和习惯都坦率，只是做事考虑太少，不注

意影响，以致大家都议论他，甚至说成了丑事。

他早就托我到公社替他问一件事（有关刚下乡知青的某个待遇的事），以前不想替他问，现在觉得应该帮他问。休息的时候，他和忠全替我扳了一大堆竹头头（枯死的竹根，用作柴火）。我觉得这两个人很勤劳，为人热情，决定明天去公社的时候一定帮大庆问那件事。

1977年8月26日

昨天上午抽了一点时间到吴叔叔家去了（他是育才学校的老校友，地下党员。打倒“四人帮”后，育才的校友们开始恢复联络，互相走动，他家住在北碚朝阳中学。我把他当成水平很高的师长，向他请教，把自己写的短篇小说《竞争》给他，请提意见）。

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出乎意料，他说我“立场、观点都成问题”！（他说：竞争，是资本主义的特点，社会主义是不提倡竞争的。我非常失望，决不认可他的批评，我看到了这一类老干部思想的僵化和平庸。写了一大段感慨和议论，长达三页）

1977年8月28日

近来感到精力不足。集中精神于一点，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对其余的事情就不免丢三拉四。特别是近几天睡眠很少，越到夜深越是注意力集中，头脑清醒，而白天有时就像丢了魂一样。我知道这是不好的症象。但愿不要年纪轻轻就神经衰弱。

说来也好笑，我每天在外面跑（当出纳要外出联系工作、结账收款、购买农资物品之类），碰到一些不太熟悉的人们，又是谈话涉及年龄，我告诉他们我已快30岁了。而他们往往不信任地瞅着我，意思是：“哼！你也有30岁！”

我决心不让这几年宝贵的时间浪费掉，应该学习一点东西。疲倦也罢，事情多也罢，甚至神经衰弱也罢，我仍然要以顽强的毅力学下去。

1977年8月30日

昨天替农机厂油印了一些加工单，弄得污脏，很不雅观，我感到不好意思，罗世模（这时是农机厂厂长了）和刘英进却满不在乎，还很感谢我呢。罗世模跟我脾气合得来，当我告诉他我对机械很笨拙时，他很中肯地说：“那是因为你从小没学习过这些，现在又没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去。如果你搞上了这项工作，全心全意去学习操作，用不了多久就会习惯的。”

今天下午跟王亚文一同回来，我告诉她，去年一年，我对社会的基本认识混

乱到了极点，现在才基本弄清了。但是，理性上认识清楚了，感情却还一直转不过弯来。

1977年8月31日

下午在大队开会学习，我作为整党中的党外积极分子参加。

大队宣传队重新成立，他们希望我能去参加。但我决不会去自找麻烦。不过，如果要我找点材料，写点什么，还是可以的。

王书记叫我跟妇女队长把政治夜校抓起来。梁万华也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给我。

我已经快满26岁了（已经是农村中典型的剩女），前车之鉴可戒，过去的教训一定要吸取。自己本身的弱点，客观条件造成的困难，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都要想一想。

1977年9月4日

（经常联系公社的两辆拖拉机为生产队砖瓦厂运煤，是那种前有驾驶室、后面挂拖车的大拖拉机。与两名拖拉机驾驶员渐渐熟悉）吴师傅是梅花山中学初67级学生（比我高一级，我是初68级，我们都没念完初中），他1969年参军，跟李大彬同年参军的。1973年转业，转业就开拖拉机。他已经结婚了，他爱人也是宣传队积极分子，以前跟我认识。

吴师傅对文学，对诗词，对政治，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对诗词更有一个初步的、粗略的、全面的了解，在农村小伙子中太少见。我佩服他。我提了一个问题，是经过多次、反复证明过的问题，而他回答得相当出色。他说：“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力量，从经济地位着眼分析的。现在不能用单纯经济观点去分析社会。例如，现在知识分子中的某些叛徒、特务、犯严重错误的人，是我们的敌人，是敌我矛盾，但他们的工资就比中小学教师、比农民高得多。这是按劳分配原则决定的，他的工作不同嘛，国家还要利用他嘛。再如，农村中，一个富农或地主家庭有五口人，五口人中有四个劳动力。但一个贫农家中也有五口人，这五口人中只有一个半劳动力，那么，谁的生活好些？当然是地主家庭好些。这是按劳分配原则决定的。虽然那些人政治地位低，但经济条件却好得多。”

吃中饭的时候，见一个妇女抱着个孩子，背着背篋，没买饭，只买了菜，在邻桌吃。大概这个妇女没有粮票。张师傅和吴师傅都很同情她，张师傅甚至想把自己的饭端给她。但是我也没有多的粮票，都是按规定从生产队领的。张师傅也不可能饿着肚子开车。再说，没粮票没钱的人真是太多了（运煤时经常在外面吃

饭。生产队在外面联系的煤厂，有嘉陵江对岸的两三处煤矿，其中刘家沟煤矿是道路最糟糕的一处，一去就是一整天；有从三溪口转弯进入一个深山沟里的煤矿，那里的煤质量很好；还有槽上公社的一处煤矿，路很陡。按惯例，吃饭时驾驶员要有一个荤菜，或者加一个素菜。如果一个荤菜分量足够，也可不加素菜。饭只有三两，没有多的粮票。根据情况，有时可以喝酒。有一次我给他们买的五加皮酒，他们喝得多，我也喝了。那天是我第一次喝酒，不知轻重，看看一两酒也没多少，一口就吞下去了。那天三个人都喝醉了，都通红着脸，吴师傅的眼神都是迷糊的，摇摇晃晃地从很陡很窄的山路上下来，总算平安地把煤运回来了，他俩在部队时都是汽车兵，技术过硬。现在回想，感到后怕）。

1977年9月7日

吴师傅把他拿去的《牛虻》三天就看完了，拿来还给我。我说很想听听他的见解，附近却没个凉快处，于是我和他到瓦屋去（砖窑外面存放砖瓦坯的地方）。

他说：“没意思，实在没意思！牛虻只是一个大傻瓜，实在傻得很！他死得没有价值！像他这么一个天然的领袖，本来不该死的，他却自己软弱了，在神父面前畏缩了，结果害了他自己，也害了神父，同时对他所正在进行的事业，对他的同伴，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大无畏气概也没什么价值！……他最有意义的是跟那个妓女的关系，帮助她，让她自立，好让她最终有能力离开他……”

这本书我太熟悉了，并不如他所贬得一钱不值。书里的一般细节也没什么不好懂的。我本来很佩服吴师傅，现在对他疑惑起来……

1977年9月10日

（我跟会计的关系在发生变化）会计是一位老会计，业务很熟。以前我没当出纳时，利害关系不同，上班同他嘻嘻哈哈，但在现金、粮食账上一窍不通，有时怀疑是否受他愚弄。

现在，利害关系互相制约了，有时他在现金上要我帮忙，有些事他怕我顶出去。对我的往来账他比从前细心些了。我有意识地和他搞好关系，以减少麻烦。但是在大原则上我和他是互不侵犯的。他很有经验，从不越轨。

但是，因为他的家庭经济困难（他有4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尚未出世时，因为计划生育已经执行得比较严格，他属于严重超生，妇女主任和妇女队长一起要求他爱人把胎儿做掉，他爱人找算命先生掐算，说怀的是个儿子，因此绝不愿意做掉。被逼得悬梁自尽，未遂，很吓人），他对实际利益看得很重，对工分不放过一分一厘。今天我去找他查发票，知道他决不愿耽误挣工分的时间，就约他休息时间回家去查。但是刘小模叫我们不能休息太久。会计一听就不走了（怕耽误

太久被扣工分)。我想下了班回家去查也一样，叫他下班再去。谁知道一下班他婆娘叫他去担粪（担粪计件算工分），他头也不回就跟着女人走了，把我气得吹胡子。心想这么一丁点事情都不肯帮忙，今后你找我时，我也照样办。

后来一冷静，想到这是他不识时务。他把个人利益，哪怕一丁点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惜用人缘、用信用作牺牲，他的家庭也必定搞得很糟糕。同时，他也确实劳累、辛苦，我犯不着与他一般见识，特别是在利害关系上。我求他的地方还多，如果现在搞僵了，将来不好相处。

我在他家等了他一个多钟头，怒气慢慢消了。等他回来，见他汗流浹背，又动了怜悯之心，不和他计较了。

1977年9月11日

出纳上街的时间多，相对地上班（野外劳动）的时间少，由于出纳工作多是单独进行，遇到的情况复杂，社员一般对这件事情不了解，容易产生意见。有些说“你一个月难得劳动五天”，或是“本来没事，你要去找些事来做”，或“你一天光想耍”。

意见并不严重，可是很难听。我很怕别人跟我过不去，说这些难听的话。另一个队的出纳小刘经常被群众攻击，说她上街的时间太多。但是还有一个队的出纳小万上街的时间多，群众却没意见，因为她比小刘聪明。

我自己必须注意。跟领导的关系，梁万华对我是宽厚和信任的，刘远明也不会在工分上和我过不去。注意一下办事集中，事情少尽量不上街。多到坡上劳动，跟组里的人搞好关系。总之一个人做事水平应该高一点。

1977年9月18日

令人不太愉快的是宣传队缠着我。这次重去宣传队看看，本出于另外的考虑（是为了表明我在政治上关心的态度），但现在却脱不开了，他们老是纠缠不休。

李白诗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臾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目前我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希望自由自在过一辈子，不受羁绊，不受管辖，逍遥取乐，愿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再要我受什么领导或权贵约束，内心将会十分不情愿。这就是我目前的思想。

（我的知青日记到此结束）

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在没有思想准备、更毫无学业准备的情况下去参加

了，考分上了榜。填志愿时，考虑到自己学历低、年龄偏大，在表格上选来选去，填了个綦江县师范学校。妹妹丹平也上了榜，填志愿填了重庆幼儿师范学校。之后我们参加了体格检查。

但是录取通知书老是不送来。母亲急了，托人去幼儿师范学校打听，人家说：没见过你家孩子的材料啊！再打听，才知道北碚区教育局（或是招生办）依然极左，把所有考上分数线的“黑五类”子女的材料都压下了，他们认为这些人不应该通过政审。

但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大地，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历史的脚步了。1978年夏天又举行高考，这次我们铆足了劲，积极复习功课，找来许多复习材料，每天背书，背了个昏天黑地。梁万华很支持我，开头每天让我上街为队里买东西，实际上给我留足复习时间。后来又找了个男青年暂时接下出纳工作，让我请了假复习。有一段时间，上街为生产队买了东西后，我就到西师去，晚上住在赵彦青老师家，第二天清早回生产队上班。

著名的吴宓教授也住在这栋楼里（现在这栋楼被称为“吴宓故居”，其实吴宓只住了其中一个房间），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有一天在楼道里与一位瘦高个子的老人擦肩而过，一个相熟的女孩悄悄对我说：“他就是吴宓！”

赵老师的爱人是中学数学教师，她教我数学，我的数学突飞猛进，从初中二年级直奔高中二年级。

另一方面，物质艰苦，体质很差。每天晚上，饿得我头昏眼花，咬着牙坚持。为了不影響赵老师家的生活，每晚我在他们家隔开的厨房里学习。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烧点开水喝。偶然发现厨房抽屉里有一小盒冬瓜糖，忍不住偷吃一块，实在忍不住，又吃一块，也不敢再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一小盒冬瓜糖被我偷吃了三分之一。至今觉得对不起赵老师。

1978年夏天高考上线以后，丹平被四川大学经济系录取。我被西南师院中文系录取。丹平先报到，去了成都。记得我的录取通知书送来的时候，生产队里不少人还按文革时的思维习惯冷言冷语地说：“上大学，凭什么这家人的子女要去两个？凭什么贫下中农子女一个也不能去？”

他们忘了，我本来就不是这里的人。而且没有谁不允许他们的子女参加考试。

1978年10月，我满了27岁。生日之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去西师的东方红大会议室（文革时改的名字）报到。

据《吴宓日记》中的记载，正是在这个大会议室里，21年前的1957年5月11日，在这里召开全校教授、副教授、讲师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张永青院长作主席，党委委员皆列席，在上午的会上，我的父亲孙铭勋第四个发言，为陶行知洗雪，将陶行知比之苏联的伟大教育家马卡连柯，并列举

陶行知教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同点，认为应该表扬陶行知艰苦办学的精神。这一则史料，是 2005 年前后我才查阅到的。

1978 年 10 月 28 日，我在西师中文系 3129 教室正式上课。

1979 年我父亲的“右派”罪名得到“改正”，恢复中共党籍，母亲的“右派”也“改正”了（居然没查到她被定“右派”的组织结论，但因是学校领导在大会上宣布的罪名，有参加大会的教师作证，因此也得到“改正”。不然，连“改正”的待遇也得不到），调回西师附小工作，弟弟和外婆跟随母亲进了城。

至此，我们一家彻底离开了农村，也告别了一个时代。

（上图：被剥夺在校读书权利、当了近十年知青的孙丹年终于在 1978 年跨进了大学校门。）

